

拉曼大學

中華研究院中文系

茅坤論韓愈、柳宗元之文

科目編號： ULSZ 3078

學生姓名： 張瑜蕓 CHONG YU YUN

學位名稱： 文學士（榮譽）學位

指導老師： 余歷雄 博士

成交日期： 2015 年 04 月 03 日

本論文為獲取文學士榮譽學位（中文）的部分條件

目次

題目	i
摘要	ii
宣誓	iii
致謝	iv
第一章：緒言	1
第一節：選題意義	1
第二節：前人研究結果	3
第三節：研究方法	8
第二章：茅坤對韓柳文的文學接受	11
第一節：茅坤的文學接受與文學理論	11
第二節：茅坤擇韓柳文為《文鈔》之動機與原因	16
第三章：茅坤論韓文	23
第一節：韓文的八代崛起	24
第二節：韓文本色	33
第四章：茅坤論柳文	47
第一節：柳文的相輔展翅	48
第二節：柳文文道	55
第五章：結語	71
參考文獻	73

茅坤論韓愈、柳宗元之文

摘要

茅坤是“唐宋派”其中一位代表文人，亦是《唐宋八大家文鈔》的編者。《文鈔》裡頭收錄了唐宋時期八位文人的作品以及編者自身對於這些文章的評論。除了展現出茅坤在學習古文時對於這些文章的見解、批評，亦表達茅坤自身文學理論。

《文鈔》中所收錄的韓愈、柳宗元兩位唐代文人，在唐代時期為了將當時盛行的駢文風氣矯正回來，開始於文壇中推行古文運動，倡導人們研習秦漢時期或以前的文章。韓愈文章中的自成一格以及柳宗元文章的相輔相成，使得茅坤將此二人作為《文鈔》中的首二位文人代表。除了彰示著他所推崇的文學理論的開端，亦表達了他自身文學接受的傳承。

茅坤對於韓愈、柳宗元之文的評價除了在他編書時給予的那三言兩語之論以外，亦可從他為他們的《文鈔》所著的“引”中看出端倪。在茅坤眼中，韓文的“首振而出”、柳文的“相輔羽翼”，這些以外都有另有著更深的文章特色以及應該注意學習的地方。

故此論文中將配合茅坤的文學接理論論他對韓、柳之文的接受，接著再通過他所撰寫的《韓愈文鈔引》以及《柳宗元文鈔引》開始解析他眼中二位文人的特色，最後再輔以他對他們文章的評價，架構出完整的“茅坤論韓愈、柳宗元之文”的框架。

宣誓

謹此宣誓，此論文由本人獨立完成，凡是論文中引用他人資料、著作亦或者參考文獻，不論是電子、書面文字或是口頭資料，都將於注釋具體寫明出處，并仔細列出相關參考書目。

簽名：

(張瑜蕓)

學號：11ALB02992

日期：

致謝

這一份打從一開始定下題目后就終日陪著我惶惶不安渡日的論文終於完成以後，心中留下的，除了是一份滿足，其實也夾帶了一絲的空虛。一種完成了一個階段必定要經歷的一個驗證的感覺；一份完成了以後未來將會何去何從的感覺。大學三年，一份畢業論文，裡面摻雜的情緒實在太多太多。

對於一開始不知道要從哪一方面下手的自己，很感激余歷雄博士作為論文導師，每次都有一種較輕鬆愉悅的情況下慢慢引導著自己走向想去的地方。面對未來的那份不安，除了有對其自身的不確定以外，其實更多的，是擔心往後的日子是否會讓老師蒙羞。尤其當你面對的是打一開始見面就特別敬佩他做學問的方式，看問題的態度的老師，心中的不安感著實是更加強烈的。

而對於家中兩老，心中感激的情緒自也不言而喻。雖然對於在處理的論文課題他們並不熟悉，但在心中有疑惑、不安、不想繼續的時候都是他們陪在自己身邊。告訴自己繼續努力下去的原因。

一直在身邊幫忙打氣的朋友也很感謝。一個人做一份研究的吃力，往往會讓人變得情緒易怒煩躁，如果沒有他們在身邊一直扶持，我想這份論文應該也無法順利完成的。

總而言之，論文的完成，學士的畢業並不表示知識與研究的探知就此結束。衷心感謝一直陪在自己身邊的人，也希望自己會繼續在這條路上走下去。

第一章 緒言

“唐宋八大家”概念的雛型其實是源於南宋呂祖謙編撰的《皇朝文鑑》。后明初朱右所編的《八先生文集》首次將八位唐宋文人齊名而論。明中葉時期，“唐宋派”興起，其中一位古文學者唐順之編《文編》，收八大家之文為一集，“唐宋八大家”由此定型。而同期的另一古文學者茅坤，十分推崇《文編》。落職而居于鄉的茅坤，在鄉居期間同時教導學生學習古文。為能讓學生理解學習古文之徑以及宣導唐宋派理論，茅坤于六十八歲時編撰了《唐宋八大家文鈔》¹一書，收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澈八人之文。《文鈔》編成之後，因受後世之人所重視，也由此奠定了八人在人們心中的“唐宋八大家”地位。茅坤在《文鈔》中所撰寫的評論，也為後世人們在認識此八人文章時有了基本的依據。韓文與柳文作為唐代文人代表被選入茅坤所的《文鈔》之中，除了是因為茅坤自身對於這二位文人文章推崇，亦有其身處自身時代中必選這二人的原因。故在此論文中將探討的議題，便是茅坤對韓愈文與柳宗元文的看法與其選擇這二位文人的意義。

第一節 選題意義

自茅坤撰《文鈔》，為後世之人撰寫古文之時提供了範本。八大家之文也因此較之前更為人們所關注，為八大家文章做注校解者自亦不在話下。在浩浩人海之中擇明茅坤為此論文研究對象，除茅坤乃落實并宣揚了八大家文章與名聲之人外，

¹ 一下敘述將簡略為《文鈔》。

亦因茅坤編《文鈔》之餘將自身對文章為評論批註在其中，為此文集添了更深一層之含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有一段評語為如此：“然八家集浩博，學者遍讀為難，書肆選本，又漏略過甚，坤所選錄，尚得煩簡之中。集中評語，雖所見未深，而亦足為初學者之門徑，一二百年以來，家弦戶誦，故亦有由。”²

縱觀茅坤為八大家之文所做之注，篇幅雖短小卻能作為引入點讓後世之人在學習之時能夠有所悟之餘不影響其思想，使人能夠自省其文中之意。故，茅坤之《文集》已被用作後世之人的古文教科書範本。另，《文鈔》亦可作為探究茅坤評價唐宋八位文人的一本評論集與資料集。由此便引申出此論文研究的一大方向，即明代茅坤在編撰《文鈔》之餘，在閱覽這些作品時是如何看待其文與其人的。

“唐宋八大家”顧名思義即概括了唐與宋二代之文人。此八人中韓愈及柳宗元二人為唐代古文代表，另六人則為北宋古文代表。《文鈔》內收韓愈文鈔十六卷、柳宗元文鈔十二卷、歐陽修文鈔三十二卷、王安石文鈔十六卷、曾鞏文鈔十卷、蘇洵文鈔十卷、蘇軾文鈔二十八卷、蘇轍文鈔二十卷，總一百四十四卷。其中更有茅坤各為他們所撰寫的引與傳，總計八篇，寫其鈔所收錄之人文采與文數量，其中則涵蓋了茅坤對其文人的看法。話雖如此，僅憑《文鈔》中茅坤對各篇章的評論來解其感尚嫌不足，因其資料整理起來不僅繁瑣，且所含之信息過於零散而雜亂。

韓愈與柳宗元二人，身為唐代時期的文人，在當時候反對駢文而倡導古文的運動上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而明代的茅坤在明中葉時也遇到了同樣需要反對一種文

²紀昀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集部三十九》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30頁。

體而倡導另一種文體的狀況。在這樣的情況下茅坤選擇了這兩位文人作為“八大家”的兩位首要代表人物，其實是茅坤作為一次文學改革首要推出的兩個代表，即彰顯茅坤反對崇古擬古的決心，亦告訴眾人自己所推崇的唐文中便包含了這樣的思想函以。那麼，茅坤對於韓愈的文章和柳宗元的文章的文學接受是怎樣的？對於這二人的文章又有何看法？這問題卻無人對此進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此論文研究將以茅坤如何評斷韓柳文為主軸，再輔以茅坤所撰《昌黎文鈔引》與《柳州文鈔引》為切入點探討茅坤眼中的韓愈與柳宗元文章。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在收集關於茅坤、韓愈與柳宗元的資料期間，發現前人對於韓愈、柳宗元的文章雖多有研究，對於茅坤的研究卻是極少的。關於茅坤前人研究，目前所擁有的研究著述包括了張夢新的《茅坤研究》³，側重點為茅坤之生平事跡、年表、文學論點以及茅坤之文學創作和張夢新與張大芝一起點校的《茅坤集》⁴。針對茅坤對於韓柳之文評價類的研究卻寥寥無幾，目前所見研究較多乃關於茅坤與《文鈔》的研究，其中就包括了莫山洪的《論茅坤對柳宗元文章的接受》⁵、林春虹《〈唐宋八大家文鈔〉與茅坤的文統觀》⁶和閔澤平的《茅坤與唐宋八大家學術譜系的構建》⁷。

³ 張夢新著，《茅坤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⁴ 張大芝、張夢新點校，《茅坤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⁵ 莫山洪著，《論茅坤對柳宗元文章的接受》，《欽州學院學報》第28卷第1期，2013年。

⁶ 林春虹著，《〈唐宋八大家文鈔〉與茅坤的文統觀》，《江西科技師範學院學報》第2期，2012年。

⁷ 閔澤平著，《茅坤與唐宋八大家學術譜系的建構》，《長江學術》第3期，2010年。

在前人研究的範圍里，韓、柳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為兩種形式。一為收錄成集的研究成果，即著書；二為單篇發表論文。唐代的韓愈研究著述則有羅聯添的《韓愈研究》⁸和鄧潭州的《韓愈研究》⁹。另外亦有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韓愈研究》¹⁰，共兩輯、陳新璋等人出的《韓愈研究》¹¹還有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韓愈研究論文集》¹²，將與韓愈相關的論文收錄成書。而以“韓學”為主要的研究則有楊國安著的《宋代韓學研究》¹³以及閻琦和周敏著的《韓昌黎文學傳論》¹⁴。對於韓愈的考究則包括了宋代呂大防的《韓愈年譜》¹⁵、陳克明的《韓愈評述》¹⁶、陳新璋的《韓愈傳》¹⁷劉國盈的《韓愈評傳》¹⁸、錢基博的《韓愈志》¹⁹、市川勘的《韓愈研究新論》²⁰、洪流等著《韓愈的一生》²¹和幾位外國學者的研究就包括了前野直彬的《韓愈的生涯》²²還有清水茂的《韓愈》²³。

其他關於其散文、資料與文集的整理就有陳發前的《韓愈文集探元決異》²⁴、董弟德校註《韓集校註》²⁵、鄧國光《韓愈文統探微》²⁶、高海夫編《韓愈散文精

⁸ 羅聯添著，《韓愈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年。

⁹ 鄧潭州著，《韓愈研究》，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¹⁰ 方烈文、陳新璋、曾楚楠編，《韓愈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¹¹ 陳新璋、方烈文、曾楚楠編（1998），《韓愈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¹² 《韓愈研究論文集》，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

¹³ 楊國安著，《宋代韓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¹⁴ 閻琦、周敏著，《韓昌黎文學傳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¹⁵ 【宋】呂大防著，《韓愈年譜》，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¹⁶ 陳克明著，《韓愈評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¹⁷ 陳新璋著，《韓愈傳》，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¹⁸ 劉國盈著，《韓愈評傳》，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

¹⁹ 錢基博著，《韓愈志》，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

²⁰ 市川勘著，《韓愈研究新論》，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

²¹ 洪流、黃挺、曾楚楠著，《韓愈的一生》，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²² 前野直彬著，《韓愈的生涯》，東京：秋山書店，1966年。

²³ 清水茂著，《韓愈》，東京：岩波書店，1958年。

²⁴ 陳發前著，《韓愈文集探元決異》，西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

²⁵ 董弟德校註，《韓集校註》，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6年。

²⁶ 鄧國光著，《韓愈文統探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

品選》²⁷、方崧卿《韓集舉正》²⁸、何法周《韓愈新論》²⁹、胡守仁《韓愈敘論》³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³¹、錢伯城《韓愈文集導讀》³²、吳文治《韓愈資料彙編》³³和《韓愈》³⁴、孫昌武《韓愈散文藝術論》³⁵、楊國安《宋代韓學研究》³⁶還有殷孟倫和楊慧文的《韓愈散文選註》³⁷。

與韓愈散文創作研究相關的前人研究結果就包括了錢基博的《韓文讀語》³⁸、陳柱的《札韓篇》³⁹、王錫昌的《韓愈評傳》⁴⁰、孫昌武的《論韓愈的散文藝術成就》⁴¹、胡守仁的《試論韓愈的散文》⁴²、張嘯虎的《試論韓愈政論散文的藝術成就》⁴³、饒德江的《論韓愈傳記文學的生命力與藝術美》⁴⁴、龔德才的《澹宕多奇不類舊常——試論韓昌黎碑誌創作的成就》⁴⁵、曾子魯的《試析韓愈散文立意謀篇的“奇處”》⁴⁶和《試析韓愈散文的“變”與“奇”》⁴⁷、周奇文的《淺談韓愈散

²⁷ 高海夫編，《韓愈散文精品選》，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²⁸ 方崧卿著，《韓集舉正》，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

²⁹ 何法周著，《韓愈新論》，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

³⁰ 胡守仁著，《韓愈敘論》，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³¹ 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³² 錢伯城著，《韓愈文集導讀》，巴蜀出版社，1993年。

³³ 吳文治著，《韓愈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3年。

³⁴ 吳文治編著，《韓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³⁵ 孫昌武著，《韓愈散文藝術論》，南開大學出版社1986年。

³⁶ 楊國安著，《宋代韓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³⁷ 殷孟倫、楊慧文著，《韓愈散文選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³⁸ 錢基博著，《韓文讀語》，《光華大學半月刊》第1卷地1-5期，1932年。

³⁹ 陳柱著，《札韓篇》，《學術世界》第1卷第8-12期，1936年。

⁴⁰ 王錫昌著，《韓愈評傳》，《時代青年》第1卷第2期，1936年。

⁴¹ 孫昌武著，《論韓愈散文的藝術成就》，《遼寧師院學報》第2期，1981年。

⁴² 胡守仁著，《試論韓愈的散文》，《爭鳴》第2期，1981年。

⁴³ 張嘯虎著，《論韓愈政論散文的藝術成就》，《中州學刊》第3期，1984年。

⁴⁴ 饒德江著，《論韓愈傳記文學的生命力與藝術美》，《武漢大學學報》第3期，1987年。

⁴⁵ 龔德才著，《澹宕多奇不類舊常——試論韓昌黎碑誌創作的成就》，《中國文學研究》第1期，1987年。

⁴⁶ 曾子魯著，《試析韓愈散文立意謀篇的“奇處”》，《江西師院學報》第4期，1982年。

⁴⁷ 曾子魯著，《試析韓愈散文的“變”與“奇”》，《青海師院學報》第3期，1983年。

文“尚氣”的風格特征》⁴⁸、《時代需要與韓愈散文之風格》⁴⁹和《韓愈的人格與散文風格》⁵⁰、孫金榮《韓愈散文與政治》⁵¹、張國榮《韓愈散文的藝術成就》⁵²、郭明達的《論韓文的雄渾》⁵³、吳小林的《論韓愈散文的結構美》⁵⁴、鄧小軍的《韓愈散文的藝術境界》⁵⁵、鹿琳《試論韓愈散文的章法美》⁵⁶、範文志《讀韓愈散文的諷刺藝術》⁵⁷和《試論韓愈散文的語言美》⁵⁸、黃傑忠《委婉、雄直：韓愈贈序藝術探微》⁵⁹和王章煥的《韓愈散文的敘事藝術》⁶⁰等。當然，有正面的評價也會有負面的觀點，周作人的《談韓愈與桐城派》⁶¹以及高則明的《韓退之“挨罵”》⁶²皆點出了韓文的一些不足之處。

柳宗元研究的著述則包括了孫昌武著的《柳宗元傳論》⁶³、吳小林的《柳宗元散文藝術》⁶⁴、段醒民的《柳子厚寓言文學微探》⁶⁵、顧易生的《柳宗元》⁶⁶、施子愉《柳宗元年譜》⁶⁷、文安禮《柳先生年譜》⁶⁸、吳文治《柳宗元年譜》⁶⁹、

⁴⁸ 周奇文著，《淺談韓愈散文“尚氣”的風格特征》，《長江師院學報》第2期，1984年。

⁴⁹ 周奇文著，《時代需要與韓愈散文之風格》，《長春師院學報》第3期，1986年。

⁵⁰ 周奇文著，《韓愈的人格與散文風格》，《長春師院學報》第2期，1990年。

⁵¹ 孫金榮著，《韓愈散文與政治》，《山東社會科學》第5期，1995年。

⁵² 張國榮著，《韓愈散文的藝術成就》，《大學文科園地》第2期，1987年。

⁵³ 郭明達著，《論韓愈的雄渾》，《語言文學論文集》，北京：北方論叢叢書，1985年。

⁵⁴ 吳小林著，《論韓愈散文的結構美》，《文學評論》第1期，1986年。

⁵⁵ 鄧小軍著，《韓愈散文的藝術境界》，《人文雜誌》第1期，1994年。

⁵⁶ 鹿琳著，《試論韓愈散文的章法美》，《齊齊哈爾師院學報》第6期，1992年。

⁵⁷ 範文志著，《讀韓愈散文的諷刺藝術》，《齊齊哈爾師院學報》第2期，1991年。

⁵⁸ 範文志著，《試論韓愈散文的語言美》，《大慶師專學報》第2期，1991年。

⁵⁹ 黃傑忠著，《委婉、雄直：韓愈贈序藝術探微》，《河池師專學報》第1期，1992年。

⁶⁰ 王章煥著，《韓愈散文的敘事藝術》，《河南師大學報》第7期，1996年。

⁶¹ 周作人著，《談韓愈與桐城派》，《人間世》第21期。

⁶² 高則明著，《韓退之“挨罵”》，《寫作與閱讀》第1卷第4期，1937年。

⁶³ 孫昌武著，《柳宗元傳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⁶⁴ 吳小林著，《柳宗元散文藝術》，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⁶⁵ 段醒民著，《柳子厚寓言文學微探》，天津：文津出版社，1978年。

⁶⁶ 顧易生著，《柳宗元》，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2年。

⁶⁷ 施子愉著，《柳宗元年譜》，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

⁶⁸ 文安禮著，《柳先生年譜》，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1875年。

《柳宗元資料彙編》⁷⁰、《柳宗元簡論》⁷¹和《柳宗元評傳》⁷²、臺靜農《柳宗元》⁷³、陶劍琴《柳宗元》⁷⁴和汪乃珍撰《柳宗元生平及其永州八記研究》⁷⁵。另亦有盧寧著《韓柳文學綜論》⁷⁶。

前人對於柳宗元的散文研究包括了陳必詳的《柳宗元筆下的小石潭》⁷⁷、太田次男的《長安時期的柳宗元》⁷⁸、王達津的《談散文的意境——兼談“永州八記”》⁷⁹、吳文治的《論柳宗元文學創作的藝術風格》⁸⁰、星川清孝的《永州山水與柳宗元》⁸¹、黃雲眉的《柳宗元文學的評價》⁸²、劉大傑的《柳宗元及其散文》⁸³、振甫的《柳宗元的散文》⁸⁴、唐良等的《試論柳宗元散文的思想性》⁸⁵、胡守仁的《柳宗元散文述評》⁸⁶、孫昌武的《試論柳宗元的散文藝術》⁸⁷、吳莉莉的《柳文的悲劇美》⁸⁸、吳小林的《論柳宗元散文的幽美》⁸⁹、鄧小軍的《柳宗元散

⁶⁹ 吳文治著，《柳宗元年譜》，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2年。

⁷⁰ 吳文治著，《柳宗元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4年。

⁷¹ 吳文治著，《柳宗元簡論》，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9年。

⁷² 吳文治著，《柳宗元評傳》，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2年。

⁷³ 臺靜農著，《柳宗元》，華岡出版社。

⁷⁴ 陶劍琴著，《柳宗元》，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0年。

⁷⁵ 汪乃珍著，《柳宗元生平及其永州八記研究》，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91年。

⁷⁶ 盧寧著，《韓柳文學綜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

⁷⁷ 陳必詳著，《柳宗元筆下的小石潭》，《語文戰線》第4期，1980年。

⁷⁸ 太田次男著，《長安時期的柳宗元》，《斯道文庫論集》第2期，1963年。

⁷⁹ 王達津著，《談散文的意境——兼談“永州八記”》，《散文》第3期，1980年。

⁸⁰ 吳文治著，《論柳宗元文學創作的藝術風格》，《文學論集》第一集，1979年。

⁸¹ 星川清孝著，《永州山水與柳宗元》，《新積漢文大系季報》第46期，1976年。

⁸² 黃雲眉著，《柳宗元文學的評價》，《文史哲》第10期，1954年。

⁸³ 劉大傑著，《柳宗元及其散文》，《文學遺產選集》第3集，1960年。

⁸⁴ 振甫著，《柳宗元的散文》，《新聞戰線》第19、20期，1959年。

⁸⁵ 唐良著，《試論柳宗元散文的思想性》，《揚州師院學報》第9期，1962年。

⁸⁶ 胡守仁著，《柳宗元散文評述》，《江西師院學報》第1期，1980年。

⁸⁷ 孫昌武著，《試論柳宗元的散文藝術》，《南開學報》第3期，1980年。

⁸⁸ 吳莉莉著，《柳文的悲劇美》，《讀寫月報》第11期，1988年。

⁸⁹ 吳小林著，《論柳宗元散文的幽美》，《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5期，1989年。

文的藝術境界》⁹⁰。關於柳宗元的散文研究，多以文體類區分，就如關於他山水遊記之研究有周徵的《讀柳子厚山水諸記》⁹¹、振甫的《談柳宗元的山水記》⁹²、溫至孝的《論柳宗元的山水遊記》⁹³等；之於他在永州時所作的“永州八記”之研究則有楊慧文的《論柳宗元的永州八記》⁹⁴、鹿琳的《〈永州八記〉——柳宗元的精神世界與自然的完美融合》⁹⁵；傳記類的研究有周陸軍等的《論柳宗元傳記的獨特性》⁹⁶、鹿琳的《柳宗元傳記文學的特色》⁹⁷；政論文、雜文類的研究則有彥季的《柳宗元的議論文——讀柳宗元文札記》⁹⁸和張嘯虎的《柳宗元的政論文學作品》

99

縱觀前人對韓柳文與茅坤先生對韓柳的研究而言，關於茅坤為八家做評論與撰序的動機和其看法的研究尚未被人們所注意，然而茅坤作為明代唐宋派的一個重要代表，所編《文鈔》亦是影響後世人們深遠，故其著實是一項值得人們付諸心力的研究領域。

第三節 研究方法

首先此論文將以茅坤編撰的《唐宋八大家文鈔》中《韓愈文鈔》和《柳宗元文鈔》里的文章以及評論作為首要參考資料來源。在論述茅坤如何看待韓愈與柳宗

⁹⁰ 鄧小軍著，《柳宗元散文的藝術境界》，《四川師大學報》第1期，1993年。

⁹¹ 周徵著，《讀柳子厚山水諸記》，《光華大學半月刊》第4卷第9期。

⁹² 振甫著，《談柳宗元的山水記》，《長江文藝》第1期，1962年。

⁹³ 溫至孝著，《論柳宗元的山水遊記》，《西北師院學報》第1期，1982年。

⁹⁴ 楊慧文著，《論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唐代文學論叢》第3輯，1983年。

⁹⁵ 鹿琳著，《〈永州八記〉——柳宗元的精神世界與自然的完美融合》，《齊齊哈爾師院學報》第6期，1994年。

⁹⁶ 周陸軍著，《論柳宗元專輯的獨特性》，《湖南師大學報》第4期，1989年。

⁹⁷ 鹿琳著，《柳宗元傳記文學的特色》，《齊齊哈爾師院學報》第5期，1991年。

⁹⁸ 彥季著，《柳宗元的議論文——讀柳宗元札記》，《光明日報》，1961年06月25日。

⁹⁹ 張嘯虎著，《柳宗元的政論文學作品》，《文史知識》第9期，1990年。

元文章之前，為了能夠更加了解茅坤對這二位文人文章的評價與接受，亦會使用張夢新所著的《茅坤研究》、《明史》以及不同的中國文學史之中所論及的茅坤形象。配合茅坤所著的《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與《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為輔，探討茅坤對韓柳文的文學接受。在這個部分中，會首先配合茅坤所著《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和《復唐荊川司諫書》這兩篇最能突出茅坤文學理論的文章開始論述茅坤的文學接受以及文學接受的成型方式。而後在同一章中，也將以此來對茅坤收韓愈及柳宗元二人作品入《文鈔》的原因以及茅坤對他們的文學接受程度進行論述。

另外《韓愈資料彙編》以及《柳宗元資料彙編》二書在提供許多與研究相關古籍資料上給予了很大的幫助。而後，在論述茅坤為兩本《文鈔》所做的引時，再配合《舊唐書》、《新唐書》以及歐陽修與蘇軾的文集，開始為茅坤在引中所著的韓柳形象進行討論。接下來，再為茅坤對這二位文人的文章進行的評價進行分析、歸類、篩選、以及統計的工作。之後再經由統計及篩選後的文章加以論述在茅坤眼中的韓愈以及柳宗元文章的形象。

本文將以茅坤的背景開始，先論述他與唐宋文之間的淵源、他的唐宋派理論、他的文學接受以及他的文學觀基本受到了那一位文人的影響。再更深一層的加以論述他編選《文鈔》的目的以及僅僅選擇了韓愈以及柳宗元兩位文人的原因。解決了茅坤背景的問題以後，開始正式對茅坤論韓、柳兩位文人以前，會先以茅坤為韓、柳二人撰寫的引作為起點，開始論述韓、柳文的文章始于唐代的原因，還有這兩位文人作品中的主要特性。接下來，便是將經過統計的韓、柳文章加以辨析，論述茅坤眼中此二人的作品中到底有什麼特點。

因此，此論文將分成幾個部分進行討論：一為茅坤的文學理論成型原因以及《文鈔》編撰原因；二為茅坤擇韓、柳二人入《文鈔》的原因；三為從茅坤為韓、柳二人所撰寫的引中看茅坤對於他們的看法；四為從茅坤對其文章評論中論茅坤對此二人的文章看法。在論述過程中，希望能夠妥善利用《文鈔》中的文章與評論對茅坤論韓愈、柳宗元之文做出完整的詮釋。

第二章 茅坤對韓柳的文學接受

茅坤，字順甫，號鹿門，浙江歸安華溪（今湖州花林）人。生於明朝正德七年七月（八月三十一日），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九十歲。嘉靖十年，茅坤第一次參加科舉考試落榜后數次再考亦無法成就。直至嘉靖十七年，茅坤才最終成為了進士。據張夢新的《茅坤研究》中載的《明清進士題名碑錄》表示，嘉靖十七年戊戌科，共取 320 名，而茅坤則名列三甲第一名。茅坤逝世時雖已九十的高齡，然而其在位為官的時期卻不長。嘉靖三十四年，尚且四十四歲的茅坤便已落職還鄉，展開了他近四、五十年的鄉居生涯。茅坤一生結識了許多文人朋友，更與歸有光、唐順之和王慎中等人結成了後世所稱的“唐宋派”。在萬曆七年間，他編成了影響後世對“唐宋八大家”印象極為深遠的《文鈔》。《明史·茅坤傳》有記載：“坤善古文，最心折唐、宋諸大家文，所著文編，唐、宋人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選八大家文抄。其書盛行海內，鄉里小生無不知茅鹿門者。”¹⁰⁰由此可以看出茅坤對於奠定了唐宋八大家地位的貢獻。

第一節 茅坤的文學接受與文學理論

茅坤的文學理論在萬曆七年編成《文鈔》時可以說已是一個成熟完整的體系。此時的茅坤在自身的文學理論表面上主要是站在推崇唐宋兩朝文章的立足點之上，實際上卻不盡然。推崇唐宋兩派的古文並非是茅坤一開始的文學接受，而是在日漸增加的閱讀經歷與體認之後一步一步慢慢架構成的。這種文學理論架構體現在他的文學作品上最為最詳細的文章有二，一為《復唐荊川司諫書》；二為《與蔡白石太

¹⁰⁰ 張廷玉，《明史·茅坤傳》卷兩百八十七，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 7375 頁。

守論文書》。《復唐荊川司諫書》作於嘉靖二十三年，屆時茅坤三十三歲；而《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作於嘉靖三十年，茅坤四十歲。這兩部作品皆是在茅坤尚未落職還鄉前寫的，這時候唐順之也依舊在世。茅坤在這兩部作品里幾次三番地提到唐順之對他說過的話，也表示自己是因此而有所醒悟。故此可以說明茅坤的文學理論與接受皆是在他尚未鄉居以前便成型了，且受到了唐順之非常大的影響。

兩篇文章之中均能夠看出茅坤最先醉心的文章風格其實是秦漢時期之文。爾後他雖在許多文章中均指出了這時候的前後七子在為文上的刻意模仿秦漢之文，然而實際上茅坤也擁有過這樣的時期。在《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中他就曾經坦言了：

僕少喜為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若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慘側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為者。獨怪荊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致其至而何輕議為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于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乃取百家文之深者按覆之，臥且吟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自各有其至，因而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¹⁰¹

此時茅坤仍在仕途上，卻已是在被貶謫期間，他在書信的開頭便已表示自己因為貶謫期間無事，便開始將以前所學拿出來重新認識，也整理出了自己的一套文學理論。茅坤自己承認在他最初一開始學習作文之時亦是有過一段模仿司馬遷的時光，且是到了“若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慘側悲悽也”的程度。而那時候的茅坤，是秉持著“唐以後，若薄不足為者”的態度來對待唐以後的文章的。文章中所提到的

¹⁰¹ 茅坤著，《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茅坤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165頁。

荊川，說的是茅坤在文學道路上最為重要的一名朋友——唐順之，唐順之作為茅坤的友人，很大程度地影響了茅坤的文學觀，在上述的文章裡頭，茅坤因為唐順之的那一句“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致其至而何輕議為也？”而開始去思考唐以後散文的價值，後來才慢慢開始接受了唐宋時期的古文。有一點在這裡必須澄清，茅坤與唐順之等人雖然皆為唐宋派的代表人物，然而真正欣賞并推行唐文與宋文的其實是茅坤，其餘的歸有光、唐順之等普遍上更傾向于宋文而非唐宋文。後世之所以將他們歸為唐宋派，與其說是以他們推崇的文章來區分，不若說其實是受到了茅坤所提出來的整體文學理論的影響。以下將會論述之。

茅坤所提出來的關於其散文的文學理論，其實主要是為了能夠與當時的前後七子的文學理論抗衡，在茅坤身處的明中葉時期，復古思潮興盛，許多的派別都如雨後春筍一般冒了出來，而前後七子的復古擬古，則在很大程度上被當時文人們接受。七子們被稱之為“秦漢派”，顧名思義便是推崇秦漢時期文章的派別。只是他們的“推崇”並不僅僅是呼籲人們閱讀學習當時的文章，更多的是要求人們摹擬秦漢時期的文章字句。茅坤與他唐宋派的友人們并不讚同這樣的文學觀點，他認為為文不應該是一味的摹擬之作，而是應該學習古人作文時的神韻，並將這些東西自我消化以後變成自己的東西。茅坤等人雖被成為唐宋派，然而除了推崇唐宋文以外，亦推崇秦漢時期的文章，不過要求人們學習的東西卻不一樣。

在《復唐荊川司諫書》中茅坤曾如此與唐順之討論過自己的文學觀點：

嘗聞先生謂唐之韓愈，即漢之馬遷；宋之歐、曾，即唐之韓愈。某初聞而疑之，又從而思之。其大較雖近，而其中之深入處，竊或以為稍有未盡然者。古來文章家，氣軸所結，各自不同。譬如堪輿家所指“龍法”，均之縈擇起伏，左回右顧，前拱后饒，不致沖射尖斜，斯合“龍法”。然其來龍之祖，及其小大力量，當自有別。竊謂馬遷譬之秦中也，韓愈譬之劍閣也，而歐、曾譬之金陵、吳會也。中間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稱百二十二之異。而至於六經，則昆侖也，所謂其祖龍是以。故愚竊謂今之有志於為文者，當本之六經，以求其祖龍。而至於馬遷，則龍之出遊，所謂太行、華陰而秦中者也。故其氣尚自宏遠。若遽因歐、曾以為眼界，是猶入金陵而覽吳會，得其江山逶迤之麗、淺風樂土之便，不復思履峻、函以窺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諸作，其旨不悖於六經；而其風調，則或不免限於江南之形勝者。¹⁰²

茅坤所講求的“龍法”，是建立在六經的基調上的，六經是“昆侖”亦是“祖龍”。在六經的基礎上，要再滲透司馬子長以及韓愈等人的古文中之“神理”。在文章中茅坤也提到這樣的滲透並不是要求文章刻意的強求其中的字句對照，而只是追求其中的神韻精髓。原文為下：

為文不必馬遷，不必韓愈，亦不必歐、曾；得其神理而隨吾所之，譬提兵以搗中原，惟在乎形聲相應，緩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於伏險出奇，各自有用，何必其盡相同！¹⁰³

其為文不必像司馬遷、韓愈、或是歐陽修等人，而是“得其神理而隨吾所之”。他認為“而至於伏險出奇，各自有用，何必其盡相同”，每以為文人在為文做字只是

¹⁰² 茅坤著，《復唐荊川司諫書》，《茅坤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191-192頁。

¹⁰³ 茅坤著，《復唐荊川司諫書》，《茅坤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191-192頁。

都有自己的用意，下筆之時自然便會有其奇之處，又何必完全一樣。從這裡便可以看出茅坤對於其文壇上那一種以為崇古擬古的為文方式的不滿與批評。

提到為文時所追求的神韻，茅坤在文章之中所追求的其實是一種“情”與“神”相結合的境界。他在《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中也曾提出過這樣的觀點：

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遊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其於文也亦然。¹⁰⁴

由於重視的文章中的“情”與“神”，茅坤希望得到的是一種“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的境界，而不是“區區句字之激射者”，倘若一位文人在為文時因過分重視文章的形式而忽略了文章中要表達的情，這是非常不應該的。因此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中也曾經明確的提出了自己欣賞秦漢之文與唐宋之文的原因：

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谷大川，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采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霆擊，韓愈之文也；巉岩崩崩，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¹⁰⁵

¹⁰⁴ 茅坤著，《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茅坤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165頁。

¹⁰⁵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4頁。

茅坤認為不論是司馬遷、班固，還是韓愈、柳宗元、歐陽修，在他們的文章之中皆擁有一種使人醉心折服的神韻在。譬如司馬遷的文章是“如長谷大川”的；班固的文章是“斟酌經緯”；韓愈文章“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霆擊”；而柳宗元的文章則“巉岩崩崩，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

故在此可為茅坤的文學理論做一個小總結，即茅坤認為為文者必須以六經為基礎再加上學習古文中的神韻，使得文章中即可擁有古文中的情與神相結合的美感，又不失自己的風格，並且茅坤是極力反對一味的崇古擬古的那一類只重視形式而不重視神韻的為文方法的。上面方才也提過，唐宋派在推崇唐宋古文之餘其實也同時醉心秦漢時期的文章，因此茅坤的文學接受與其說是受唐宋時期的文章影響，不如說是在秦漢時期的文章風韻的基礎上，將自己的文學理念消化并同時運用在唐宋時期的文章上。而想當然爾，茅坤對於唐宋時期的文章是給予高度肯定的評價的，這一點可以從他著手編撰《文鈔》并對之加以一條條評論上看出。除此之外，在上述所提到的《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中亦可說明唐宋文章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與地位其實是與秦漢時期的文章在同一個位置上的。

第二節 茅坤擇韓柳文為《文鈔》之動機與原因

在論述茅坤為何要將韓柳二人作為《文鈔》的首開二文人之前，首先要釐清的，是茅坤編《文鈔》的目的。就如上述所言，茅坤編成《文鈔》時是萬曆七年，

此時的茅坤已經是六十八歲高齡的老翁了，從仕途上隱退也已經有二十四年的時光。對於鄉隱之後的生活，茅坤大抵上將自己的時間都花在了文學研究上面。在他四十五歲的時候，好友唐順之編成了《文編》六十四卷，其中收錄的作品就包括了秦漢時期以及唐宋時期的作品，而唐宋文人便是後來茅坤收於《文鈔》的那八位代表人物。有學者以為茅坤的《文鈔》是在唐順之的《文編》的基礎上編成的，這一點並不能完全被否定，因為茅坤的文學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唐順之的影響的，根據《明史》記載：“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然而，從唐順之編選的《文編》中亦可以發現他並非只推崇唐宋文而是秦漢與唐宋文皆得，可至於茅坤以後卻僅存唐宋時期的文人代表而不露秦漢之文。這中間的緣由便仍得上究到茅坤編選《唐宋八大家文鈔》時的動機。在《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中茅坤有提到：

孔子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逸不傳。而秦人燔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晁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輩，始乃稍稍出，而西京之文，號為爾雅。崔、蔡以下，非不矯然龍驤也，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隨、唐之間，文日以糜，氣日以弱，強弩之末，且不及魯縞矣，而況於穿札乎？¹⁰⁶

這裡說明的是茅坤的一種文學理念，他所推崇的文章乃是自六經以後直至秦漢時期的文章，他認為在秦漢以後“六藝之旨漸流失”，而直到唐以前的文章都可謂是“文日以糜，氣日以弱”的。而使他動手開始編選評論《文鈔》的，乃是為了抗衡當時前後七子所推崇的“秦漢派”。他在敘文中寫道：

¹⁰⁶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10，第3-5頁。

我明弘治、正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豪雋輻輳，已振詩聲，復揭文軌，而曰吾《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黃初、建安矣。以予觀之，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于古六藝之遺，豈不堪淫滌濫，而互相剝裂已乎！¹⁰⁷

茅坤認為像前後七子等人雖然標榜著崇古擬古的旗幟在當時掀起的有一股復古思潮只是一種外表看起來大義凜然，實際上在行剽竊之實的舉動。對於這樣的舉動，茅坤是抱著一種不齒的態度的。他說：“世之操觚者，往往謂文章與時相高下，而唐以後且薄不足為。”¹⁰⁸當時的“秦漢派”代表李夢陽推出的文學理念便是一種“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理念，且認為文章是一代不如一代，然而茅坤卻以為：“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也”¹⁰⁹。因此，他在文中亦說：

予於是手撮韓公愈、柳公宗元、歐陽公修、蘇公洵、軾、轍、曾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微批評之，以為操觚者之券，題之曰《八大家文鈔》。家各有引，條疏如左。¹¹⁰

為了堅定自己反對“秦漢派”觀點的茅坤在選取文章之時特別選擇了唐宋時期的文章，目的就是告訴當時的人們唐以後的文章亦有值得學習效仿的地方。然而必須再次聲明的，是在茅坤心目中的文學接受，除了唐宋時期文章以外亦是包括了秦漢時期的文章的，這一點在上一節便已經論述過了。

¹⁰⁷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10，第11-12頁。

¹⁰⁸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10，第9頁。

¹⁰⁹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10，第9頁。

¹¹⁰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10，第12-13頁。

在茅坤編選文章之時取唐代文人二位為韓愈和柳宗元；宋代文人六位為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和蘇轍，除了是受到了唐順之的《文編》影響以外，亦有自己的觀點。在上一節中也提到唐順之相較於唐文更傾心與宋文的觀點，然而茅坤卻不盡然。在《文鈔》中，他不僅將韓愈與柳宗元的文章置於整本文集的首兩位，更是將韓愈作為八大家之首來端正整個八大家的文學地位。一樣是在《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裡面，茅坤有提到：

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序、記、碑、銘、頌、辯諸什，故多所獨開門戶，然大較并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¹¹¹

韓愈對於茅坤而言，是自秦漢后的文學風氣逐漸糜爛以後照亮出來的第一道陽光。除此之外，韓愈之於茅坤亦有一種自成一家之言的存在。茅坤再為韓愈之文作評價是於《送浮屠文暢師序》中提出：“高在命意，故迥出諸家”¹¹²的論述；在《送王秀才序》中亦有：“退之立自己門戶”¹¹³的語論，與之相近的評論在茅坤所編的文集中還有八篇，這一點會在下一章“茅坤論韓文”中在加以論之，這裡便先點過不再提。因此，如此自成一家的韓愈之於茅坤欲使自己的文學理論在當時站穩腳步而言便成為了十分重要的一個存在。

再者，柳宗元文章存在的必要性則是他作為與韓愈文章“從而和之”的存在。在唐代的時候，柳宗元的文章聲望其實是高於韓愈的。自宋代歐陽修開始推崇韓愈

¹¹¹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10，第5-6頁。

¹¹² 韓愈著，《送浮屠文暢師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293頁。

¹¹³ 韓愈著，《送王秀才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273頁。

之文起，韓愈在文學領域上的地位才逐步被提升，然而柳宗元的文學地位卻始終沒有因此而被忽略，反之是將韓愈與柳宗元相提並論，因此茅坤想以韓愈之文作為他打響“唐宋派”文學理論的第一炮，柳宗元的文章對他而言也就變得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韓愈與柳宗元在少年開始作文以前所接觸的文章大抵都是茅坤所推崇的六經與秦漢之文為主，故其文章之間便可循“六藝之遺”。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依舊可以“獨開門戶”，因此茅坤稱他們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

從另一點來看，茅坤編《文鈔》的用意除了是評擊“秦漢派”的從古擬古外，還有另一個用意便是將這部文集作為這時候的一本教科書而進行編撰的。而距離茅坤提出自己的文學理論至他編成文集，中間其實相隔了有二十八年的時光了。促成他著手編撰的，是這時候的一種文學風氣。明代中葉時期的復古派相當興盛，然而所謂復古卻各有各家的說法。再這樣的情況下為了能夠是自己的盧綸站穩腳步，茅坤便必須擁有一步能夠彰示著自己的復古風格的東西。為此《文鈔》便是不可或缺的。而在《文鈔》中，韓愈與柳宗元的存在亦是不可或缺的，除了因為上述已經提過的理由之外，還因為他們的文章風格中擁有茅坤所欲宣揚的理念。韓愈文章的“吞吐駢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霆擊”¹¹⁴；柳宗元文章的“巉岩崩岑，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¹¹⁵，還有兩者文章之中所帶有的六經、秦漢文的思想，都與茅坤在其文學理論上所強調的那一種學習古代文章的風韻時不失自己論調的意思不謀而合。于似乎在茅坤決定以唐宋時期的文章作為自己理論的一種基調時，韓柳之文成為了必不可少的存在。

¹¹⁴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4頁。

¹¹⁵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4頁。

茅坤的《文鈔》不僅在文學的地位上奠定了“唐宋八大家”的名目，其中所宣揚的文學理論亦是影響了後世的文人們。而對於這部文集，後世雖亦有褒貶，但其價值亦是不可被磨滅的。作為八大家的首二位代表人物，在茅坤的推崇下亦是擁有了更堅定而不可磨滅的文學地位。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里有云：

然八家集浩博，學者遍讀為難，書肆選本，又漏略過甚，坤所選錄，尚得煩簡之中。

集中評語，雖所見未深，而亦足為初學者之門徑，一二百年以來，家弦戶頌，故亦有由矣。¹¹⁶

這裡說的是明清時期時文人所面對的一種學習上遇到的版本問題。茅坤所編的這部文集，雖裡面的評語只有寥寥數語，然對於初入學習文章的人們而言卻無疑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習管道，故稱“一二百年以來，家弦戶頌”。面對後世如此的評價，在這裡亦要引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中的一段話為他做些辯護：

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矣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義所揭，指次點綴，或於道不相盪已。¹¹⁷

茅坤自稱“不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故在評點各家文章之時“矣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只能“要之大義所揭，指次點綴，或於道不相盪已”。由於認為自身對於各家的文章要義還沒完全掌握好，所以僅只是點出了各篇文章中的大方向，目的是為了讓人們在學習文章的時候能夠不與其中的“大道”相駁斥。茅坤的文學理念是學習古人文章亦要有自己的本事，故在此亦可推斷說茅坤之所以將其點評僅

¹¹⁶ 紀昀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集部三十九》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30頁。

¹¹⁷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10，第13頁。

以兩三句點筆帶過，便是不欲讓後世人們在閱讀之餘過分看重他所認為的意思，而是將他的點評作為一種拋磚引玉的公用，企圖帶出後世各文人們學習時所領悟到的重點。

第三章 茅坤論韓文

韓愈是中唐時期一位極力推崇古文發展的重要先驅。韓文的出現為後世開了一個楷模，使後世的文人在習古文時無不以韓文為模範，宋代大文豪歐陽脩曾曰：“其後天下學者已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¹¹⁸ 韓愈觀以先秦兩漢之書，認為自魏晉以後之文一代不如一代，孔子所遺留下來的六藝也已被人們所遺忘。故將自身所學之古文精髓融會貫通，而文自成一家。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載：

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序、記、碑、銘、頌、辯諸什，故多所獨開門戶，然大較并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¹¹⁹

明代中葉“唐宋派”興起，明代的復古思潮增添了更多的文章學習典範要旨。唐宋派將唐宋文推舉出來以圖能夠使明代的散文風氣趨於唐宋時期。其中茅坤更是將韓文作為其中一個重點模範教授于門生。在編撰《文鈔》時，茅坤將韓文作為第一位文人代表，稱集為《韓愈文鈔》。此舉說明了韓愈作為一位古文家的重要代表在茅坤心中的文學地位是十分崇高的。

¹¹⁸ 歐陽脩著，《記舊本韓文后》，《歐陽修全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第1056-1057頁。

¹¹⁹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5-6頁。

《韓愈文鈔》收韓愈文一百九十篇文章，另有茅坤所著《韓文公文鈔引》與《韓文公本傳》二篇以補充說明其文與其人之特點與生平。既然如此，茅坤對於韓文究竟存在著何種看法，是褒？是貶？茅坤為何會有對韓文有此評價？此其中的觀點是否受他人影響？在此章節中，敘述部分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將視角從茅坤為《韓愈文鈔》所著的《韓文公文鈔引》入手，解析茅坤對韓愈的評價，此評價的由來與是否受前人影響的問題。完成以後，再進入第二部分延續此前的課題將茅坤對韓文的評價做歸類，解析其中原因以建構出明代的茅坤眼中唐代的韓愈的文章形象為何。

第一節 韓文的八代崛起

茅坤為《韓愈文鈔》作引，首一句先揭唐以前的文學風氣曰：“魏晉以後，宋齊梁陳迄于隋唐之際，孔子六藝之遺不如絕帶矣。”¹²⁰表魏晉以後，孔子的六藝之學逐漸消散。初步說明了魏晉以後、唐代中葉以前的文學風氣總概括。此句不僅是表達出了韓愈所出現前的文壇情況，亦代表了茅坤心中的文學接受情況。而另一個目的，則是為接下來所提出關於韓文崛起於唐代之時的重要性做鋪成。

昌黎韓退之崛起德、憲之間，溯孟軻、荀卿、賈誼、晁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於是時，譽者半，毀者半，獨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孟郊二三輩，相與遊從，深知而篤好之耳。何則？於舉世聾聵中而欲獨以黃鐘、

¹²⁰ 茅坤著，《韓文公文鈔引》，《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頁。

大呂鏗鉤其間，甚矣其難也！又三百年，而歐陽公脩、蘇公軾輩相繼出，始表章之，而天下之文復趨于古。¹²¹

茅坤在這裡提到的“德、憲之間”所指的兩個帝王是唐德宗與唐憲宗。然而，唐德宗是唐代的第九位帝王，而唐憲宗則是第十一位帝王，中間實則尚有一位唐順宗。茅坤於此卻略過不提。韓愈一生在其仕途上並不算坎坷，唯一一次最嚴重的貶謫便是發生在唐順宗的時期，所捲入的紛爭後人稱之為“永州八司馬事件”，知道唐憲宗嗣位之後才重新正式啟用韓愈。茅坤在引中特地只將這兩位帝王提出來，目的是要將韓愈生平中輝煌的時光帶出來，用以提高韓愈的地位。另一方面，這兩個時期因為是韓愈在仕途上得意的時期，所以他的的文章常常顯露出一種昌盛的氣勢。

如茅坤所言韓愈起於此二人之間表明自己的文學立場，乃是因覺得魏晉以後的文學風氣逐漸弭弱，當時的學子們求取科舉之路皆使用“時文”——即駢文。然駢文發展至唐代時期開始出現了只注重與追求形式上的美感的弊病。而韓愈提倡古文，其文章之中不僅融合了儒家思想，以“文以載道”為中心，目的便是企圖讓唐代的文學風氣能夠以魏晉以前的文章風格為本，摒除時文中的弊病，使文章能夠從回秦漢時期的文章文風。

《舊唐書·韓愈傳》曰：

常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語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¹²²

¹²¹ 茅坤著，《韓文公文鈔引》，《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2頁。

韓愈之文溯先秦兩漢典籍之精髓，而後集大成地將其體現在自身的文章里。然而這樣大膽兒創新的想法卻因影響力的不足與人們思想上的局限因素，在唐中葉時期只得一班文人好友，如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孟郊的支持。故茅坤稱當時的情況“于舉世聾聵中而欲獨以黃鐘、大呂鏗錡其間”。黃鐘與大呂乃《禮記·月令》中所載河洛名族傳統音樂所使用的“十二律”¹²³。其中黃鐘為十二律中陽律第一；大呂則為陰律第一。說明縱使擁有如此能夠奏出美妙厲害旋律的樂器存在，欲將其在一群耳朵失聰的人面前演奏亦是無法讓人體會他的美好的。這亦表達了茅坤以為韓文雖好，然因咎于唐代文人們不懂得如何欣賞，因此再美麗再厲害的文章在他們面前就如同一群雙耳失聰的人在欣賞音樂一樣。

幸而三百年後唐入宋，先有歐陽脩得韓文而廣之，使古文風氣在宋代吹起了一陣啟航風。宋代文豪歐陽修曾為《蘇軾文集》寫了一篇序，序中就曾提到關於韓愈之文在唐代時的情況。《蘇氏文集序》中曰：

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¹²⁴

此句不僅說明了唐代韓愈與李翱在當時代為古文奠下了穩扎的根基，亦對韓、李之古文造詣給予了肯定。歐陽脩習古文，取的古文模範便是韓愈。作為宋代極具影響力的宰相，韓文在歐手中終於廣被世人所知，古文也開始倍受重視。歐陽脩出以後，

¹²² 劉昫等著，《舊唐書·韓愈傳》卷一百六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4203-4204頁。

¹²³ 十二律：用十二個不同長度的律管，吹出十二種高度不同的音律。十二律的音律由低至高的排法為：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

¹²⁴ 歐陽脩著，《蘇軾文集序》，《歐陽修全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第614頁。

蘇軾之輩等亦繼承了歐在古文上的志向，使得古文能夠“始表章之，而天下之文復趨于古。”

茅坤將古文的最初成就推至于後來對古文發展有著極其重要影響的歐陽脩以前，除了自身對於韓文的肯定以外，另一個極重要的因素乃歐陽脩在《記舊本韓文后》一文之中曾稱“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廢棄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¹²⁵如上述所提，韓文之所以能夠被人所知，其中最大的功臣就是歐陽脩。歐陽脩推崇古文，而茅坤亦受歐陽脩影響甚多，故先立韓文之成就以確立其在古文上之地位。茅坤在《韓文公文鈔引》中用“以前朝之斃述韓文之益”的序事手法來凸顯出他筆下韓愈的形象之用意亦在於此。然而就文學發展的歷史而言，韓文在唐代并不被受重視。茅坤針對這一點在《韓文公文鈔引》中提出了這樣的觀點：

隋唐之文，其患在糜而弱，而退之之出而振之，固已難矣。迺若近代之文，其患在剿而賸，有志者苟欲出而振之，而其為力也，不尤戛戛乎其難矣哉！要之，必本乎道，而按古六藝者之遺。斯之謂古作者之旨云爾。¹²⁶

這樣的敘述方式不僅讓人一覽唐以前的文學風氣，亦可帶出茅坤對於韓文之所以無法盛行于唐做出了一種辯解。在《韓文公文鈔引》中，茅坤不僅一次先後指出“魏晉以後，宋齊梁陳迄于隋唐之際，孔子六藝之遺不如絕帶矣”或“隋唐之文，其患在糜而弱”、“固已難矣。乃若近代之文，其患在剿而賸”這樣的論述，所欲表現出來的重點並不真的在於指出這些時代之文之弊，而是說明韓愈身處的時代以前

¹²⁵ 歐陽脩著，《記舊本韓文后》，《歐陽修全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第1056頁。

¹²⁶ 茅坤著，《韓文公文鈔引》，《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2-3頁。

雖然也有推崇古文的人文集團存在，卻無人能夠擁有足以改變整個朝代文學風氣的力量。至於韓愈時代開始又一輪的古文推新思潮時，作為這樣的大環境底下的古文先鋒，其困難度可想而知，故茅坤曰：“有志者苟欲出而振之，而其為力也，不尤戛戛乎其難哉”。同是歐陽脩的《記舊本韓文后》中載：

道故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里世。韓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¹²⁷

並非韓愈之文不能行其道，只是其道被遮蔽于一時。而這些遮蔽的東西便是當時所盛行於世的時文，雖然其中有弊端，卻因韓愈一人之力過於薄弱而無法將其中之道推廣出去。然正因為道是無法磨滅的，亦不是能夠依據個人是喜惡而左右上下的，故在歐陽脩等人出現后，韓文之文方能盛行於世。而所謂能夠影響後世之人的文章，“必本乎道，而按古六藝者之遺”，如此一來“斯之謂古作者之旨云爾”。這一點恰恰是符合了茅坤自身所推行的文學理論。茅坤在明代時期反對前後七子的文學理論最重要的一點，便是他認為前後七子一味擬古的舉動只不過是一種抄襲的舉動，他認為所謂的“崇古”應該是學習六經與秦漢時期文章中的神韻，理解古人為文時所要表達的道。因此茅坤特別推崇韓文，乃至將韓文作為“唐宋八大家”的首位文人代表。

¹²⁷ 歐陽脩著，《記舊本韓文后》，《歐陽修全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第1057頁。

茅坤在《韓文公文鈔引》中說：“予故于西漢京而下，八代之衰不及一人也。首揭昌黎韓文公愈……”¹²⁸指的是在西漢以後，將起八代之衰之人皆指向一人，此人指的亦自然要是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之言乃是出於蘇軾所寫之《韓文公廟碑》：

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弱，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奮三軍之師。¹²⁹

西漢以後至韓愈之出，八代之文逐漸衰彌，而韓愈之文一出，八代之衰皆起。這是蘇軾文章中所要表達的意思。雖“起八代之衰”的說法這樣的說法並非首出于茅坤之筆，茅坤在《韓文公文鈔引》中卻將韓愈的地位更深地提高了一層。茅坤認為西漢以後的文章，沒有一個人能像韓愈一樣復興八代文章的衰敗之像，也因此蘇軾的意思中韓愈只不過是一位將文章的衰敗重新恢復一點生機的文人；於茅坤韓愈卻是西漢以後所有的文人都不及一位韓愈的文章。從這裡便可看出茅坤對於韓愈文章的重視度。

此前的段落中，茅坤所言之韓愈皆是一種普遍概念中的韓愈。無論是關於韓文在古文上的成就還是韓文在古文上的重要性演變或是茅坤對於韓愈的看法皆是一種宏觀的角度。至於茅坤眼中真正的韓愈之文可見於《韓文公文鈔引》中的最後第

¹²⁸ 茅坤著，《韓文公文鈔引》，《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3頁。

¹²⁹ 蘇軾著，《韓文公廟碑》，《蘇詩文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509頁。

二句：“昌黎之奇，于碑誌尤為巉削，予竊疑其于太史遷之旨或屬一間，以其盛氣摺挾，幅尺峻而韻折少也。書記序辯解及他雜著。”¹³⁰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亦推韓文中最佳處為碑誌：

世之論韓文者，共首稱碑誌。予獨以韓公碑誌多奇崛險譎，不得史漢序事法，故於風神處或少道逸，予間亦鐫記其旁。¹³¹

“奇”、“巉削”、“奇崛險譎”皆是茅坤給予韓愈碑文的評價。對於韓文中最高的成就茅坤亦認為當屬其碑誌。相參茅坤的《韓文公文鈔引》與《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可以認為在茅坤的韓愈之碑誌與司馬遷在作文的宗旨上有相同之處；然而在寫作方法上卻又與司馬遷還有班固的作文方式有做不同。韓愈碑誌的刻意求奇、求變之感，使得他的碑誌備受關注，也使他少了司馬遷文章中那一種風逸的感覺。因此也成就了韓文中的“別樹一格”。在茅坤《韓文公文鈔引》的最後一句中有言：

公所獨倡門戶，譬則達摩西來，獨開禪宗矣¹³²

這裡說明了茅坤認為韓愈之文的自成一家。就如同達摩祖師自西而來首開禪宗一樣。在《文鈔》之中，茅坤對於韓愈的一些文章批註評語時也有此言，如在《送鄭尚書序》中，茅坤評韓愈“予獨按昌黎序事，絕不類史遷，亦不學史遷，自勒一家矣”¹³³，在《送李愿歸盤谷序》中，茅坤亦評“通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

¹³⁰ 茅坤著，《韓文公文鈔引》，《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4頁。

¹³¹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頁。

¹³² 茅坤著，《韓文公文鈔引》，《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4頁。

¹³³ 韓愈著，《送鄭尚書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227頁。

此又別是一格。而其造語形容處，則又鑄六代之長技矣。”¹³⁴這樣的論述表示茅坤承認韓愈在古文上的成就，尤其是在唐宋時期的古文發展中。值得注意的是，茅坤再此之前對於韓愈或韓文的觀點也許都有跡可循，然將韓文比喻為“達摩西來，獨開禪宗”卻是史無前例的。韓愈生平不喜佛教，在仕途期間更曾因為唐憲宗太喜佛的原因而寫了一篇《論佛骨表》文以表諫勸，而至於茅坤的時候卻將韓愈與禪宗的開山祖達摩放在了一起做比喻，以示韓愈新開或重開一個派別。這其中的原因可說與茅坤當時所處的情況不無關係。將達摩這一宗教的開山祖與韓愈放在同一個位置上一概而論，可以說是茅坤的一大心機。在編選《文鈔》時，茅坤最大的用意便是打擊當時的“秦漢派”，為了這一目的，新的派別是必須的，新的派別所主要推崇的目標與代表人物也是必須的。而作為被選為首位代表文人的韓愈，在文章造詣上可謂自成一家，自宋代歐陽修起便有人將韓愈文章稱之為“韓文”，更有人相互學習“韓文”的寫作方法。因此，以達摩來喻韓文，實際上是將韓文作為他自己文學理論派別的一個“開山祖”，企圖將韓文也如達摩開禪宗一樣，開啟一個屬於文學的派別宗教，使人們更相信韓文有其值得學習的地方，就如同後來影響中國甚遠的禪宗一樣，希望韓文的影響力也能為後來的文壇帶來深遠的改變。

茅坤對於韓文的評價自然不僅於此，而關於這一點且待下一節再細細論述。這裡先做一個小總結，即韓文在茅坤眼中的評價無意是讚賞多過貶低的。縱使茅坤認為韓文在神韻上尚不如漢代的司馬遷，然而正因韓文在唐代起著八代之衰之作用，後人也才能因此而接觸更多的古文，學習古人們作文的方法。

¹³⁴ 韓愈著，《送李愿歸盤谷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283頁。

那，茅坤眼中的韓愈之文又是否受了前人的影響呢？這個答案亦是肯定的。

《舊唐書·韓愈傳》載韓愈之文：

常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語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戾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序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¹³⁵

《新唐書·韓愈傳》亦載韓愈之文：

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¹³⁶

《舊唐書·韓愈傳》乃後晉時期的劉昫所撰，《新唐書·韓愈傳》則是宋代宋祁所著，縱觀這兩篇文章所述與《韓文公文鈔引》所論，並不難看出其中一些相似之處。再觀上述索引之歐陽脩與蘇軾對韓愈直觀點與茅坤之文，就能明確看出茅坤對於茅

¹³⁵ 劉昫等著，《舊唐書·韓愈傳》卷一百六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4203-4204頁。

¹³⁶ 宋祁等著，《新唐書·韓愈傳》卷一百七十六，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5265頁。

坤之看法很大程度上皆與前人相似。故亦能推論出茅坤在思想上亦接受了這些文人很大程度上的影響。

然則，茅坤在這一層次上將韓愈的地位更近一步的提升了。兩唐書雖謂韓愈為古文推動做出了大貢獻，歐蘇二人亦對韓愈在文章的成就上有所肯定，茅坤卻是直接將韓愈作為一個派別的代表人物推出文壇，使人們在習讀唐宋文時首要認識的文人便是韓愈；更使韓愈文章對於後世文人學習古文時成為了一個必不可少讀的一位人物。

第二節 韓文本色

茅坤《韓文公文鈔引》有言：“首揭昌黎韓文公愈，錄其表狀九首，書啟狀四十六首，序三十三首，記傳十六首，原議論十首，辯解說頌雜著二十二首，碑及墓誌碣銘五十二首，哀辭祭文行狀八首，厘為十六卷。”¹³⁷根據茅坤在引中所記，《韓愈文鈔》共收韓文一百九十二篇。然而重新計算之後，卻發現茅坤所錄的文章篇數有錯，於是特此更正。《韓愈文鈔》中所錄辯解說頌雜著並非二十二首，而是十九首¹³⁸，故文鈔中所收韓文應只有一百九十首，而非一百九十二首。在這一百九十首中，茅坤對韓文中做出了“本色”的直接評價的文章有五篇，分別是《為人求薦書》、《答陳生書》、《張中丞傳後敘》、《守戒》和《曹成王碑》；而在評論中間接表

¹³⁷ 茅坤著，《韓文公文鈔引》，《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3-4頁。

¹³⁸ 在此特錄《韓愈文鈔》所錄辯解說頌雜著篇名：《諱辯》、《進學解》、《獲麟解》、《擇言解》、《師說》、《雜說》、《子產不毀鄉校頌》、《伯夷頌》、《張中丞傳後敘》、《讀荀子》、《讀〈儀禮〉》、《讀〈墨子〉》、《送窮文》、《釋言》、《貓相乳》、《守戒》、《對禹問》、《通解》、《行難》，共十九篇。

明了韓文本色的評論則有《答劉正夫書》、《與李翱書》與《上張僕射書》三篇。

茅坤評價文章，往往三言兩語便將其帶過，其中深意卻只能自己研讀意會。在茅坤收韓文一百九十篇中，僅有九篇文章是與其“本色”相關，然而韓文的本色卻不僅僅只是“本色”二字所能代表的。在《答劉振夫書》中，茅坤評：“韓文公教人作文，大意要自樹立不尋常，不取悅於今世。所謂能自樹立不因尋常等，即公本來面目。”

¹³⁹ 茅坤推崇韓文，在於韓文中的自成一家、別具一格。然要寫出與眾不同的文章，就必須要具有自身不被人忽視的本色，而在韓文中，體現出了他“本色”的特點有以下幾個。

首先，茅坤認為昌黎做文其首要之旨乃要人確立自己的獨特之處，不取悅于當世之文之流行風氣，因此韓文也往往有別與人，顯現出一種“奇”的特質。在《韓愈文鈔》中，共有十六篇文章的茅坤評論中是有“奇”字的¹⁴⁰，而與之相關的評論則有《與孟尚書書》、《送楊少尹序》、《畫記》與《原道》四篇；另還有茅坤引唐順之評韓文之奇的文章有《送孟東野序》和《送何堅序》兩篇，共計二十二篇文章。茅坤不僅會用“奇”¹⁴¹，“奇氣”¹⁴²或“奇崛”¹⁴³等字眼來評論韓文中

¹³⁹ 韓愈著，《答劉振夫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73頁。

¹⁴⁰ 十六篇直接與“奇”字相關的文章篇名：《應科目時與人書》、《答呂豎山人書》、《答候繼書》、《送竇從事序》、《藍田縣丞廳壁記》、《禘祫議》、《諱辯》、《獲麟解》、《雜說》、《行難》、《衢州徐偃王廟碑》、《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瘞硯銘》、《祭河南張員外文》。

¹⁴¹ 韓愈著，《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623頁。

¹⁴² 韓愈著，《答呂豎山人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209頁。

¹⁴³ 韓愈著，《送竇從事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253頁。

奇氣；亦會用“翻覆變幻”¹⁴⁴、“出沒變化，不可捉摸”¹⁴⁵、“妙”¹⁴⁶和“變化詭譎”¹⁴⁷來點出自己對韓文中奇之處的看法。

茅坤所認為的“奇”，其實是在於韓愈善用各式各樣的寓意來敘述事情的發展經過或是傳達自己的本意。以他在元和四年為李益所寫的《送幽州李端公序》而觀，茅坤評此文：“命意高，結體奇，轉擊從天降。”¹⁴⁸所謂的“命意高”與“結體奇”指的是便文章的宗旨與作文的方式。韓愈寫此文通篇幾乎皆以對白而成，先從李益之口帶出幽州司徒公之賢，再由李益之口上諫劉益，而自己並不費多一字來描述整件事情。是為通篇之奇處。

再觀他的《祭河南張員外文》，韓愈本身並非一信鬼神之論之人，卻以怪力亂神的神秘力量之說貫穿全文，如文章中提及：

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蒙去。君云是物，不駁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征。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¹⁴⁹

又寫：

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還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岳。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鈎登

¹⁴⁴ 韓愈著，《與孟尚書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15頁。

¹⁴⁵ 韓愈著，《送楊少尹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239頁。

¹⁴⁶ 韓愈著，《畫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325頁。

¹⁴⁷ 韓愈著，《原道》，《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351頁。

¹⁴⁸ 韓愈著，《送幽州李端公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235頁。

¹⁴⁹ 韓愈著，《祭河南張員外文》，《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664頁。

大鮎，怒頰豕狗。鬻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¹⁵⁰

以自然界神奇之力喻事已使人耳目一新，再者通篇皆以四字做成，讀之一氣呵成。這樣的寫法不僅免去了祭文常給人帶來的幽怨哀傷之感，更是叫人嘖嘖稱奇。故茅坤贊此文“奇崛鬥神鬼處，令人神眩。”¹⁵¹

又如同他在應試博學宏詞科時所作的其中一篇《應科目時與人書》，通篇以一怪物貫穿全文，雖是應試之文，卻只在結尾處點出唯一一句關於自己的句子。篇中雖寫怪物，卻用“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¹⁵²諷刺那些表面雖參加科舉考試實際上卻是對主考官們阿諛奉承之人；再說“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睹也”¹⁵³譏諷那些主考官們的貪污和無能。茅坤評此文為：“空中閣樓，其自擬處奇，而其文亦奇。”¹⁵⁴既然是“空中閣樓”，自就代表了這文章之中的意象等等的寓意皆是韓愈自己捏造出來的，然而即便是捏造之物，卻使文使文所喻之物皆奇，這一點卻是韓愈之文的特點也。明末清初的金聖歎在他《天下才子必讀書》中也提到這篇文章曰：

亦無頭，亦無尾，竟斗然寫一怪物。一氣直注而下，而其文愈曲。細分之，中間卻果有無數曲折，而其勢愈直，此真其筆怪墨也。¹⁵⁵

¹⁵⁰ 韓愈著，《祭河南張員外文》，《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664頁。

¹⁵¹ 韓愈著，《祭河南張員外文》，《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663頁。

¹⁵² 韓愈著，《應科目時與人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25頁。

¹⁵³ 韓愈著，《應科目時與人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25頁。

¹⁵⁴ 韓愈著，《應科目時與人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25頁。

¹⁵⁵ 金聖歎著，《天下才子必讀書》，沈陽：萬卷出版社，2009，第293頁。

“一氣直注而下”亦是韓愈的本色之一。韓愈作文，往往珠連砲玉似的將事情的始末敘述出來。讓人在閱讀之餘能夠隨著他的心情起伏的上下沉浸在他文章的氣勢之中，卻不會讓人感覺厭煩，而是一種怡然舒暢的感覺。因此，茅坤評韓愈之文，亦用“澹宕”二字來形容。

在茅坤對韓文的評價中，直接將“澹宕”和“奇”擺在一起評價的文章有《答侯繼書》、《藍田縣丞廳壁記》與《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三篇，用“澹”“宕”來作為評語的文章則有八篇¹⁵⁶；與之相關的評論有《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荊潭唱和詩序》和《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三篇，共計十四篇文章。“澹”指的是一種使人恬靜、安然的感覺，而“宕”則有放蕩、不受拘束的感覺。《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中茅坤稱：“吞吐馳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霆擊，韓愈之文也。”¹⁵⁷韓文中的那一種“吞吐馳頓”、“走赤電”、“鞭疾風”的特色正是一種宕的感覺，而在放蕩不羈中私人擁有一種怡然自得的那種感覺正是茅坤所欲像世人展現的。

在韓愈一篇註明的書信《後十九復上書》中，茅坤給予這樣的評語：“所見似悲憂，而文則宕逸可誦。”¹⁵⁸此書是韓愈三上書宰相的第二封書信，其中所描寫的是他欲出仕的願望，其筆調雖見悲涼，但文中卻依舊透露出韓愈自身那一種放蕩不羈的性格：

¹⁵⁶ 八篇以“澹”“宕”評論的文章：《上張僕射第二書》、《後十九日復上書》、《偉侍講盛山十二詩序》、《毛穎傳》、《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志銘》、《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志銘》、《尚書左丞孔公墓志銘》、《新修滕王閣記》。

¹⁵⁷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4頁。

¹⁵⁸ 韓愈著，《後十九日復上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03頁。

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¹⁵⁹

即使是有求于人，但所思所想所寫卻不曲卑阿諛，反之所用之語皆有二面之意。懇切中亦透露出了韓愈對於自身的一種自信。正因韓愈的性格如此，所以所寫之文也往往透露出一種“宕逸”的感覺。這一點亦如他在他第三封呈于宰相的書信，《后廿九日復上書》中顯現出來：

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¹⁶⁰

其中的宕然之氣儼然體現出來，其中的議論調理亦分明。故茅坤評此篇：“議論正大，勝前篇。”¹⁶¹

除了議論之類的文章，韓愈在為他人寫墓志銘時仍舊擁有其“誌多跌宕”¹⁶²和“雋才逸興”¹⁶³之處。茅坤在韓愈為劉昌裔所寫的墓志銘中評此文：“劉昌裔為

¹⁵⁹ 韓愈著，《後十九日復上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05頁。

¹⁶⁰ 韓愈著，《後廿九日復上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08-109頁。

¹⁶¹ 韓愈著，《後廿九日復上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08頁。

¹⁶² 韓愈著，《尚書左丞孔公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563頁。

¹⁶³ 韓愈著，《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571頁。

人多侷澹宕，而公文亦稱。”¹⁶⁴不僅是認同了韓愈對劉昌裔寫墓志銘里對他的讚賞，更是一種對韓愈之文中的澹宕的一種認同。韓愈此墓志銘的最後一句中說劉昌裔：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¹⁶⁵

墓志銘最初的用意便是為有德行之人立下銘文以供後世之人能夠有機會一睹其生平事跡以及其功德。韓愈在為他寫的另一篇《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龍武統軍贈潞州大都督彭城劉公墓碑》裡頭也提起了劉昌裔的為人曰：

上無可怨，外無與讎。既長事官，峻之大夫。其償未塞，僕射以都。及癸巳歲，秋湧水出。流過其部，破民廬室。公即疏言，此皆臣愆。防斷不補，漬民於泉。臣耄且疾，宜即大罰。上曰災害，大臣其來。允餘之思，其可止哉。¹⁶⁶

四字成句，且音韻昂揚，使文在讀起來流暢之餘也不覺有一贅字。在《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志銘》中，韓愈採取了另一種撰文方式，不全述衛中立的生平，只撰他採藥煉金一事。文末再為衛中立留一評價為：

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¹⁶⁷

¹⁶⁴ 韓愈著，《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533頁。

¹⁶⁵ 韓愈著，《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536頁。

¹⁶⁶ 韓愈著，《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龍武統軍贈潞州大都督彭城劉公墓碑》，《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第2016頁。

¹⁶⁷ 韓愈著，《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562頁。

因不贅述其他無所為事跡，自然使文變得恬靜流暢，故茅坤評曰：“誌中無他述，獨指採藥煮黃金一事，文旨自澹宕雋永。”¹⁶⁸

茅坤曾評價韓愈：“韓公生平為文，奇奇怪怪，獨於議典禮處，文詞甚醇雅。”

¹⁶⁹端看韓愈《荊潭唱和詩序》曰：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

170

此處說的雖是作詩之道，所言卻意味深長，既是抒情亦是議論。故茅坤曰：“雋永”¹⁷¹二字。若說澹宕二字往往讓人想起一種直流而下的氣勢之感，那雋永二字則是讓人感覺一股雅緻之氣緩緩流蕩在空氣中，久散不去，且引人入勝。韓愈之文，澹宕雋永之餘，風雅語莊並存。是以在作文中亦會出現“情直而辭婉”¹⁷²的狀況。

《韓愈文鈔》中將婉與宕放在一起談的文章只有《新修滕王閣記》與《上張僕射第二書》二篇，然而提起“婉”字的評論則有《與于襄陽書》、《答元侍御書》、《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啟》、《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四篇，總計六篇文章。辭婉對於韓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韓文以其氣度見長，對茅坤而

¹⁶⁸ 韓愈著，《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561頁。

¹⁶⁹ 韓愈著，《禘祫議》，《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389頁。

¹⁷⁰ 韓愈著，《荊潭唱和詩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301頁。

¹⁷¹ 韓愈著，《荊潭唱和詩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301頁。

¹⁷² 韓愈著，《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啟》，《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217頁。

言其文“吞吐馳頓”、“怪者霆擊”，然而在這兩種氣勢下，韓文中的辭婉卻是能使其文章使人讀起來時相較的舒服。

韓愈為新修的滕王閣作記，主角雖是滕王閣，文中卻久不書滕王閣中之事，反之以滕王李元嬰的生平作為敘述的重點，從而帶出滕王閣的出現。茅坤認為此文“婉而宕。”¹⁷³指的是韓愈的敘事手法婉，而文氣宕。在韓文中常有此情況的出現，就如他的一篇勸誡之文，茅坤冠以“曲”¹⁷⁴字所評論。韓愈作文，並不常直接敘述自己的所思所想，就如同他在勸誡李渤時並非以其中之利益動人，而是以其中之弊出曉人以避開。他上書朝廷表態自己的意見想法之時，也常是先以其害處表自己其利處已讓人明白他的重要性。這一點，也是韓愈的“善喻”之處。

在《為人求薦書》中，茅坤稱“善喻卻是昌黎本色”¹⁷⁵，其中的善喻指的是韓愈文章之中常出現的隱喻之語。此文章不過二百余字，卻先以匠石、伯樂雙起帶出眾人不識真正有才華之人，而後再以伯樂喻朝中的用人之事，文雖短卻意味深長。茅坤謂韓文善喻，卻不常在評論中直敘，在《韓愈文鈔》中僅得《為人求薦書》一篇，其餘則是評論中蘊有其意思的文章如《送許郢州序》、《贈崔復州序》、《進學解》、《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志銘》、《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志銘》與《柳子厚墓志銘》七篇文章。

¹⁷³ 韓愈著，《新修滕王閣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311頁。

¹⁷⁴ 韓愈著，《與少室李拾遺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61頁。

¹⁷⁵ 韓愈著，《為人求薦書》，《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37頁。

韓愈善喻，不僅僅是美喻，茅坤亦認為“退之文多托之以諷”¹⁷⁶，如《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志銘》中，茅坤以為韓愈對於薛君之人先以奇為處事態度，以不同俗為主，而後又棄奇而以人為同，此乃是“譽而諷”¹⁷⁷之言；在《柳子厚墓志銘》中，韓愈寫柳宗元乍看之下皆是讚譽之語，卻也有令人玩味。後世人皆知韓愈在仕途上曾因“八司馬事件”和柳宗元在政見上站到了對立面，而柳宗元逝世以後，韓愈卻為柳宗元寫墓志銘：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即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¹⁷⁸

在墓志銘中，韓愈雖未對柳宗元當年與自己敵對之事不予正面批評，從“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這段文字中卻仍可見韓愈對柳宗元的不認同。韓愈形容柳宗元的才能是“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卻又表達出韓愈對柳宗元的認同。故茅坤稱其“贊子厚處，尺寸斤兩，不放一步。”¹⁷⁹

《唐故邵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志銘》中，茅坤評價：“直序，然中有諷刺，與稱美處不爽尺寸。”¹⁸⁰李公即李道古，乃李翱之子。自古墓志銘的文體特點多為讚頌已故之人的德行，李道古煉制不死藥以求寵幸的做法卻極度不為韓愈所

¹⁷⁶ 韓愈著，《送許郢州序》，《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231頁。

¹⁷⁷ 韓愈著，《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607頁。

¹⁷⁸ 韓愈著，《柳子厚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630頁。

¹⁷⁹ 韓愈著，《柳子厚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627頁。

¹⁸⁰ 韓愈著，《唐故邵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545頁。

欣賞，他在銘文之中寫“生而富貴，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買宅以葬”¹⁸¹，隱隱透露出一種諷刺的味道卻又不失其墓志銘中要求要讚美德行的標準。此為韓文中善喻之處。

除了評語中有“善喻”意思的文章外，韓愈在他其他文章中也時有運用隱喻、比喻技巧的地方出現。如《毛穎傳》中對虛設的“毛穎”的描述，毛穎本義是毛筆，這裡的毛指的則是兔子的毛髮，然而韓愈卻將之擬人化后為其作傳，且條理分明，論述更將毛穎與其歷史時代背景相結合，如今河北定縣一帶在戰國時期稱“中山”，出產了許多優良品質的兔毫，故韓愈便成毛穎為中山人。再者更引了司馬遷的史記中對毛氏一族的記載曰：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姓姬，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¹⁸²

此一說不僅將毛穎本不存在於歷史任何一處的事實自圓其說，更為毛穎定下了一個歷史身份。故茅坤稱韓愈此文：“設虛景摹寫，工極古今。其連翩跌宕，刻畫司馬子長。”¹⁸³而韓愈借寓而諷之文亦有《藍田縣丞廳壁記》中借壁而諷當世之丞不盡其職責的一篇，其中韓愈所用之語讓茅坤稱其：“詞氣多澹宕奇詭。”¹⁸⁴

韓愈之文善用寓意的方式表現出現，使文擁有其奇特之處；其文用字婉而其氣宕。然而，在茅坤眼中的韓愈本色自然亦不是全無缺失處。在《韓文公文鈔引》

¹⁸¹ 韓愈著，《唐故邵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546頁。

¹⁸² 韓愈著，《毛穎傳》，《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349頁。

¹⁸³ 韓愈著，《毛穎傳》，《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347頁。

¹⁸⁴ 韓愈著，《藍田縣丞廳壁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315頁。

中，茅坤認為韓文中的碑誌由於會刻意求奇求變，因此雖亦有所成就，相較於司馬遷的碑文亦是有“風神處或少道逸”處。再觀茅坤對其他韓愈之文所做的評價，其中一項說道：

文有精爽，但句字生割，不免昌黎本色。昌黎每自喜陳言去之，故《曹成王碑》當亦屬公得意之文。而愚見則以務去陳言，卻行穿鑿生割，亦昌黎病處。特其識正而語確，故學者不能譽。¹⁸⁵

這裡便可較明顯的看出茅坤認為韓愈文章中的缺失在哪裡。陳舊的語言雖說有時應當舍爾不用為好，然韓愈因不喜陳言，所以在作文時常會將較老舊的言辭去掉，以至於這一做法在一些時候導致了一種“句字生割”的情況出現。在《南陽樊紹述墓志銘》中茅坤也說：“昌黎文多奇崛，然亦多生割除”¹⁸⁶，文雖奇崛，句字卻不免讓人讀起來有不相連的情況出現，未免讓韓愈的文章讀起來會有“直序中多句字生蹇處”¹⁸⁷的感覺。這一些特點對茅坤而言卻也是韓愈的文章中不可磨滅的本色之一。

對於茅坤所認為的韓愈文中偶會有“句字生割”的情況，浦起龍在《古文眉詮》中對其做出了評論：

¹⁸⁵ 韓愈著，《曹成王碑》，《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467頁。

¹⁸⁶ 韓愈著，《南陽樊紹述墓志銘》，《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635頁。

¹⁸⁷ 韓愈著，《唐故相權國公墓碑》，《文鈔》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505頁。

獨其梳櫛治兵、搜擇奇字，茅順甫以生割譏之，愚亦不敢曲護。韓子言‘陳言務去，
戛戛難哉’，非自喜之辭也，蓋惟浩乎沛然，乃曰醇而肆焉，後人動以戛戛去陳判
韓文者，恐未審也。¹⁸⁸

浦起龍雖然先言其不敢曲護，然後者再引韓愈曾提出的“陳言務去，戛戛難哉”之舉說明其去陳言之難，故後人以此譏諷韓愈的文章確實是有不妥之處。此便可看出浦起龍雖認為韓愈之文難免有因去陳言而生割處，卻是一種無可避免的存在，指茅坤不應該以此為評韓愈之點。而相較於茅坤與浦起龍認為韓愈之文有生割之處，曾國潘在對韓愈的《唐故相權國公墓碑》作評論時卻以為此文：“矜慎簡練，一字不苟，金石文字之正軌也。”¹⁸⁹而王文濡更是直指：“昌黎序事，枝枝節節造有奇語，鹿門譏其句字生蹇，不足以服公之心。”¹⁹⁰

在《韓愈文鈔》中，提及“本色”的文章有九篇；“奇”的二十二篇；“澹宕”的十六篇；“婉”的有六篇；而“善喻”的有八篇。除去評論中有所重複處，茅坤收韓文一百九十篇，僅有三分之一的文章是與韓文本色相關的評論，其餘的評論多是茅坤論韓愈的作文方式。然而，雖只有三分之一的文章評論與其本色相關，其卻是茅坤認為韓文最大的精髓所在。茅坤對於韓文的看法皆繫於“本色”二字，而韓愈的本色，不僅體現在了他文之結體的奇特之上，也因他的文讓人讀起來有一種澹宕雅緻之感，而其中的婉言和善喻則說明了韓愈在作文之時善以退為進的方式

¹⁸⁸ 轉引自高海夫編，《唐宋八大家文鈔集評校注·昌黎文鈔》，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第643頁。

¹⁸⁹ 轉引自高海夫編，《唐宋八大家文鈔集評校注·昌黎文鈔》，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第692頁。

¹⁹⁰ 轉引自高海夫編，《唐宋八大家文鈔集評校注·昌黎文鈔》，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第692頁。

表述事件。其所謂的“句字生割”亦是茅坤認為韓文的本色之一。看似相互無法聯繫起來的特點其實其中不無關聯，茅坤眼中的韓愈本色也正是由此而構建起來的。

第四章 茅坤論柳文

唐代韓愈為了將當時糜爛的文學風氣矯正而提倡的古文，促使文壇上響應起一股古文運動風。而在同一時間與之相輔相成的另一唐代文人既是柳宗元。韓愈與柳宗元雖為同一時代文人，亦同為倡古反駢之友，然其二人的文章要旨卻不盡相同。宋初以來，韓、柳之名常並驅相提與文壇間，宋代穆修言：“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¹⁹¹張敦頤亦提：“至今數百年，世所推尊者，必曰韓、柳，是先生與文公之名同也。”¹⁹²

明代茅坤編撰《文鈔》時，錄柳宗元為唐代時期的第二位代表文人，稱集名為《柳宗元文鈔》。據茅坤在《柳柳州文鈔引》中的記敘，“予錄書啟三十三首，序傳十七首，記二十八首，議論辯十四首，贊雜著十八首，碑銘墓碣及誄表狀祭文二十首，厘為十二卷。”¹⁹³總計一百三十篇文章，較於《韓愈文鈔》數量相對少了近五十餘首。其在《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里有過這麼樣的一段見解：

予覽子厚之文，其議論處多鑿畫，其紀山水處多幽邃夷曠，至於墓誌碑碣，其為御史及禮部員外郎時所作，多沿六朝之遺，予不錄，錄其貶永州司馬以後稍屬雋永者凡若甘首，以見其風概云，然不如昌黎多矣。¹⁹⁴

¹⁹¹ 穆修著，《唐柳先生集後續》，《柳宗元集》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9，第1444頁。

¹⁹² 張敦頤著，《柳先生歷官紀》，《柳宗元集》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9，第1430頁。

¹⁹³ 茅坤著，《柳柳州文鈔引》，《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684頁。

¹⁹⁴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2頁。

此大概能夠為茅坤心目中柳文的形象做一個注釋。茅坤所認為的“多沿六朝之遺”，說的其實是柳宗元在尚未被貶謫以前的文風，其中就包括了駢文中綺麗的文章寫法，所以茅坤所選錄的柳文，大多是在柳宗元被貶謫以後，文風出現變化后的文章。然而相較於韓愈，茅坤對於柳宗元之文究竟存在著何種看法？其是否認為柳文不如韓文？茅坤為何會有對柳文有此評價？前人對柳文的看法是否也影響了茅坤如何看待柳文？在此章節中，引述的部分將分為兩小節。第一節將視角從茅坤為《柳宗元文鈔》所著的《柳柳州文鈔引》入手，解析茅坤對柳宗元的評價，以及此評價的由來與是否受前人影響的問題。完成以後，再進入第二節延續此前的課題將茅坤對柳文的評價做歸類，解析其中原因以建構出明代的茅坤究竟如何論唐代柳文。

第一節 柳文的相輔展翅

明代茅坤在為《柳宗元文鈔》做引時，所著的篇幅並不大，僅二百九十三字。因茅坤論柳文的方式與其論韓文的方式並不同，故此章節論《柳柳州文鈔引》的方式亦會與論《韓文公文鈔引》時有所不同。《柳柳州文鈔引》可分成兩個部分來論，第一部分談韓文與柳文的差異；第二部分則談茅坤眼中柳文的總特點。

《柳柳州文鈔引》第一部分載：

昌黎韓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宗元相為羽翼，故此唱彼和，譬之噴嘯山谷，一呼一應，可謂盛已。昌黎之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揚雄者為多，而柳州則間出

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其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沕寥，抑亦千年以來曠音也。¹⁹⁵

在上一章“茅坤論韓文”中已提過韓文在唐代古文的發展中可謂扮演著一名先鋒的角色，而每一位先鋒的身邊通常亦會跟隨著一位能夠與之披靡而又相輔相成的人物。在韓愈身處的時期，身邊雖然亦擁有能夠幫助他在古文推動上有所成就的文人，但能夠與之相輔相成的文人，在茅坤眼中則是非柳宗元莫屬。在《柳柳州文鈔引》中，茅坤提出了“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¹⁹⁶的觀點。因為有了這兩者之間的相互合作，才使得當時的文人開始知道“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觀”¹⁹⁷的想法。然則，所謂的“從而合之”並非說明在茅坤心目中柳文的文學地位並不如韓文。茅坤所言的“相為羽翼”其實是將柳文與韓文的價值相提並論，二者是站在同一個立足點之上的，因此才會有“其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沕寥，抑亦千年以來曠音也”的言論。

清代的張伯行在其《柳文引》中曾言：“然季樸有言，柳醇正不如韓，而氣格熊絕，亦韓所不及。”¹⁹⁸這個觀點雖是清代文人眼中的觀點，然而亦可說明了韓、柳文在清代人的心中其實是各有千秋的。柳文中的醇正之氣也許並不如韓愈來的渾厚，然而柳文中獨有的氣格亦是韓文所無法披靡的。就明代以前的文獻記載而論，在《舊唐書·柳宗元傳》中曾載：“宗元少聰警絕眾，尤精西漢《詩》《騷》。下筆

¹⁹⁵ 茅坤著，《柳柳州文鈔引》，《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683頁。

¹⁹⁶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總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5頁。

¹⁹⁷ 茅坤著，《唐宋八大家文鈔總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6頁。

¹⁹⁸ 張伯行著/編，《柳文引》，《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頁。

構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¹⁹⁹宋祁的《新唐書·柳宗元傳》亦說：“宗元少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²⁰⁰既是被當時的文人所推崇，那便足以說明了柳文在唐時期的地位並不遜於韓文。再更清楚的說，柳文在唐時期的地位其實是高於韓文的。這是因為韓文真正盛行起來的時期是宋代歐陽脩推廣以後，然柳文卻是“當時流輩咸推之”的。

然而，茅坤雖不認為柳文亞於韓文，在撰寫《柳柳州文鈔引》時以韓文的特點為首而後再點出柳文的特點的原因有二，其一在於唐以後因歐陽脩推韓文，以至於文人們多談韓文而柳文則常與韓文並驅而馳，故而後世的人們亦受其所影響，在談柳文時常與韓文相提並論；其二則是先前在上一章中亦曾提起的，茅坤寫引有參考了新舊唐書的本傳，那推算起來就表示了茅坤的文學接受受到了宋代宋祁和歐陽脩的影響，而歐陽脩和宋祁在為柳宗元寫傳時受了韓愈的影響，因此在茅坤筆下才會產生這一種“以韓文論柳文”的情況出現。這也是茅坤在論韓文與柳文時一個極大的差別，在論韓文時茅坤將其著重點放在了韓文的重要性及代表性；然而在論柳文時茅坤卻將其著重點放在了韓文及柳文之間的差別和特點。這樣的寫法不僅能夠突顯此二者文風上的差異，亦彌補了茅坤在撰《韓文公文鈔引》的時候僅用一二句話語便帶過的韓文特色的不足處。而這種“以韓文論柳文”的寫法在後世清代里也可參見，下述例子為張伯行的《柳文引》，描寫柳文特色的方式與茅坤在《柳柳州文鈔引》第一部分所用的寫法是差不多的：

¹⁹⁹ 劉昫等著，《舊唐書·柳宗元傳》卷一百六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4213頁。

²⁰⁰ 宋祁等著，《新唐書·柳宗元傳》卷一百六十八，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5132頁。

吾嘗論韓文如大將指揮，堂堂正正，而分合變化，不可端倪；柳則偏裨銳師，驍勇突襲，囊沙背水，出奇制勝，而刁斗仍自森嚴。韓如五嶽四瀆，奠乾坤而涵萬類；柳則峨眉天姥，孤峯蠹云，飛流噴雪，雖無生物之功，自是宇宙洞天福地。其並稱千古，豈虛也哉！²⁰¹

相參上述例子以及茅坤所寫的引，便可以十分明確地看出柳文雖然常與韓文相提並論，卻其實此二人之文其實是各有千秋。而相較於韓文的文起八代，柳文的相輔展翹雖看似地位遜於韓文，可實際上此二者是站在同一個地平線上供後世習古文者參考摹擬。

解決了《柳柳州文鈔引》的第一部分的論述以後，在進入第二部分以前，首先要知道的是關於柳文的一些特色。在引的第一部分可見茅坤對柳文特色的其一總結是“勁悍沆寥”。在《新唐書·柳宗元傳》裡頭有這樣的一句話：

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崔駟）、蔡（蔡邕）不足多也。”

202

韓愈評柳文為“雄深雅健”，說的是柳宗元整體的文章。而在《柳柳州文鈔引》中，茅坤針對柳宗元所寫的書信文章與遊記文章，也有其類似的評論：

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為掩卷累欬者久之。再覽《鉛鋸潭》諸記，杳然神游沅、湘之上，若將凌虛御風也記，奇矣哉！²⁰³

²⁰¹ 張伯行著/編，《柳文引》，《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頁。

²⁰² 宋祁等著，《新唐書·柳宗元傳》卷一百六十八，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5142頁。

韓愈所說的是柳文的整體感覺，而茅坤則是在韓愈的說法上更進一步地論述了柳文中的書信文章與遊記文章的特性。與茅坤在《韓文公文鈔引》中描寫對韓文的觀點的不同之處在於，在《柳柳州文鈔引》引中，茅坤不僅明確地表示出其對柳文的看法，更舉出了三篇文章為例來加強自己所提出的觀點。文章中的《許京兆》、《蕭翰林》諸書，其實是柳宗元在被貶永州司馬時與許孟容和蕭俛之間的書信；而《鈞潭》則為其在永州上任時游鈞潭后所寫的一篇記。觀此三篇文章的相同處，皆是柳宗元受貶之後所著，由此可見茅坤對柳文的重視是在其受貶之後所書之文章。在《寄許京兆孟容書》（即上述所表之《許京兆》）中茅坤有這樣的一個評價：

子厚最失意時最得意書，可與太史公《與任安書》相參，而氣似嗚咽蕭颯矣。予覽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及復故人書，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晚年深吾禪宗，孤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²⁰⁴

之所以說這篇文章能與太史公司馬遷的文章相參，是因為兩篇文章中“氣似嗚咽蕭颯”的部分非常相似。這是由於相較於韓文的摒棄陳言，柳文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實時常參考了魏晉以前文章的精髓。在《與蕭翰林俛書》（即《蕭翰林》）中，茅坤給予的評價是：“一悲一笑，令人破涕。”²⁰⁵，在引中卻也說“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為掩卷累欷者久之。”在這兩封書信來往中不難看出柳宗元對於自己被貶官始終抱著追悔和其才華有所不遇的想法，他以一種悲鳴的語調在述說著自己的心情。文中說：

²⁰³ 茅坤著，《柳柳州文鈔引》，《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684頁。

²⁰⁴ 柳宗元著，《寄許京兆孟容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11頁。

²⁰⁵ 柳宗元著，《與蕭翰林俛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27頁。

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

206

又說：

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²⁰⁷

此二句皆是柳文中悲愴哀鳴的代表。茅坤曾言：“予覽子厚書，由貶謫永州、柳州以後，大較並從司馬遷《答任少卿》及楊惲《報孫會宗書》中來。故其為書多悲愴嗚咽之旨，而其辭氣環詭跌宕，譬之聽胡笳、聞塞曲，令人斷腸者也。至其中所論文章處，必本乎之道，當與昌黎並驅，故錄其可誦者。”²⁰⁸柳文之所以悲愴，自然除了柳宗元其自身所思所想外還有受其文章所影響之故。這些觀點特別反映在柳宗元的書信文章上。司馬遷的《答任安書》以其中的氣之悲鳴為代表，柳宗元被貶永州后將時間與心思漸漸從政治上轉向了文學。

韓愈的《柳子厚墓志銘》中載：“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愿，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

²⁰⁶ 柳宗元著，《寄許京兆孟容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11-712頁。

²⁰⁷ 柳宗元著，《與蕭翰林俛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28頁。

²⁰⁸ 柳宗元著，《與李翰林建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07頁。

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²⁰⁹這也說明了柳文的成就確實是在被貶以後才開始輝煌起來。是以其中的摹擬之氣息，亦是茅坤對柳文的其中一個看法。

而相較於悲愴氣息濃厚的書信文，柳文中另一個被茅坤極其看重的便是其中的遊記文。雖在引中茅坤僅以《鈞澗潭記》為代表，然所編入《柳州文鈔》中的遊記許多皆是讓他以“奇”²¹⁰字為評語的，這一點在下一節中將會更詳細地探討，現在先讓焦點專注于引中的《鈞澗潭記》。

對於柳文中的遊記文，茅坤的評價是：“杳然神游沅、湘之上，若將凌虛御風也記，奇矣哉！”²¹¹所謂奇，乃是文章中所表達出來的情境與柳宗元在文章之中以小景逐大觀的本事。要描寫鈞澗潭，僅以“清而平者且十畝餘”²¹²幾字便將全貌的輪廓描寫出來。更奇的是此文章與先前的書信相同都是在被貶之後所做，所給人的感覺卻是如此的不同。文末一句“孰使人樂居夷而忘故土者”²¹³雖能讓人感覺到其中的淒楚，卻終究與書信中的大悲大愴相異，給人一種淡淡的憂傷淡淡的憂愁之感，更添悲傷。

在進入下一節更深入地探究茅坤如何論柳文之前先在此做一小結，茅坤在撰寫《柳柳州文鈔引》時篇幅雖短，所撰方式亦非以柳文為中心，然亦可看出柳文在茅坤心中的地位其實與韓文不相上下，且各有千秋。其所作之文的方式僅是因為受到了前人文章與風格的影響。茅坤對於柳宗元的看法淵源，除了是其自身對於柳文

²⁰⁹ 韓愈著，《柳子厚墓志銘》，《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第2409頁。

²¹⁰ 柳宗元著，《鈞澗潭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929頁。

²¹¹ 茅坤著，《柳柳州文鈔引》，《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684頁。

²¹² 柳宗元著，《鈞澗潭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929頁。

²¹³ 柳宗元著，《鈞澗潭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929頁。

的解讀與詮釋，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受到了韓愈的影響。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茅坤筆下的柳宗元與兩唐書中的柳宗元的神似度上看出來。在兩唐書中對於柳宗元作文的形象與特色並沒有過多的解釋，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兩唐書中關於柳宗元的記載其實也參照了韓愈為柳宗元所寫的墓志銘中柳宗元的形象，故此也可以說明茅坤對於柳宗元的看法其實是繼承了韓愈對柳宗元的看法。然則，茅坤在韓愈對於柳文的觀點上做了進一步的解析，除了將柳文的特色於他所錄的《柳宗元文鈔》中一一解析，對於韓愈僅評價了柳文的總體特色這一點，茅坤是做了更細緻的分類的。柳文在茅坤眼中的形象從這一點看來便更值得再做更深一層的論述，這些都將會在下一節中一一敘述。

第二節 柳文文道

茅坤收柳文一百三十篇入《柳宗元文鈔》，其中有書啟三十三首，序傳十七首，記二十八首，議論辯十四首，贊雜著十八首，碑銘墓碣及誄表狀祭文二十首。從這裡可以看出茅坤對於柳文中書與啟的文體是相對重視的。茅坤稱柳宗元“最失意時最得意書”²¹⁴，指的是柳宗元在被貶謫以後與友人所通的書信文章，柳宗元被貶謫以後，由於將時間心思皆投入文章裡頭，在文學的造詣也相較於從前的好。對於柳宗元貶謫前的文風，茅坤亦有過這樣的評論：“其為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多沿六朝之遺，予不錄。錄其貶永州司馬以後稍屬雋永者凡若干首，以見其風概云”²¹⁵。

²¹⁴ 柳宗元著，《寄許京兆孟容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11頁。

²¹⁵ 柳宗元著，《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073頁。

由此看來，柳文發展於茅坤而言可分為兩個時期，前期乃為其在京任職時文章，其風格“大都未免為唐以來四六綺麗之遺”²¹⁶；而後期方受則為其貶謫以後，其文風“文近於西漢矣”²¹⁷。

柳宗元被貶謫之柳州之後曾經書信給李建說起自己被貶謫的心情與近況：

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什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²¹⁸

被貶謫以前的柳宗元可謂將全副心思放在仕途之上，一心致力於政治上的革新運動，以至於在為文為章上的成就並不突顯。然而貶謫以後，柳宗元將時間與精力皆運用在做文章之上。韓愈在柳宗元逝世以後為其做墓志銘時曾曰：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即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愿，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²¹⁹

將身心皆投入至文章中的柳宗元在這時候再度拾起書本開始閱讀起來，此時的文風亦因此而有了轉變。故韓愈的墓志銘中言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而縱觀茅坤對於柳文的評價，可從其編撰《文鈔》時所著之《唐東八大家文

²¹⁶ 柳宗元著，《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117頁。

²¹⁷ 柳宗元著，《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1117頁。

²¹⁸ 柳宗元著，《與李翰林建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09頁。

²¹⁹ 韓愈著，《柳子厚墓志銘》，《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0，第2409頁。

鈔論例》中觀，其言也：“巉岩崩崩，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²²⁰

《柳宗元文鈔》的茅坤評論中有所提及“道”的文章有兩篇，即《與李翰林建書》和《與楊誨之疏解車意第二書》；有所關乎道的文章也有兩篇，即《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和《柳宗直西漢文類序》。這僅四篇的文章雖只佔了柳文評論中極小的一部分，卻是茅坤所論柳文之中最重要的要旨。在對柳文的評論之中，茅坤所論及最多的便是柳宗元作文的文法。然而零零散散的評論並不足以讓人將柳文中的作文文法總結出來。在深一層地說，柳文的作文文法其實正是基於柳文的文道所體現出來的，因此在柳文之中，文道其實佔了相較其文法更重要的位置。柳宗元的文道，則體現在了幾個方面。

首先，先來看一段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的自白：

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

²²⁰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文鈔》第一冊，安徽：黃山書局，2010，第4頁。

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²²¹

茅坤認為這一篇文章能夠代表柳宗元其生平之文的大宗旨。茅坤說：“子厚中所論文章之旨，未敢必其盡能如雲要之，亦本於讒心研神者而後之。為文者，特路剽富者之金而以誇於天下曰：‘吾且漪頓矣！’何其不自量之甚也。予故奮袂曰：‘有志於文，須本之六藝，以求聖人之道其庶焉耳。’”²²²，更稱讚這篇文章是柳文書信中寫得很好的一篇。在這一篇文章中，柳宗元明確地表示了他所讀的每一篇文章與聖賢之書之於他而言都有著不同的喻示，因此他每一次寫文章皆“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未嘗敢以矜氣作之”。而對於茅坤之前所言柳文中擁有的關於司馬遷之文的神似處，亦能用柳宗元在這封書信中亦以“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來回答。柳宗元與韓愈的性格并不太一樣，讀書做文章的方法自然也會因此而有所不同。韓文因韓愈將所學所讀所思所想皆溶於其身心再書寫出來，因此寫出來的文章並不會擁有太多的陳言，文章中也因此有別於他人的奇妙出；而柳宗元則因將所學所讀皆作為一個模範、導向，故此在文章之中常出現一些神似的摹擬之跡，然這類跡象卻不是一味的可以模仿，亦是經過自我的內在吸收之後轉而運用一些古人的基調來加強自己所欲表達的東西。

關於柳文中的摹擬之跡，茅坤在整理柳宗元文章時亦將此現象作為對柳文的其中一個看法記錄在評論中。在《柳宗元文鈔中》，有提及關於其摹擬之跡的評論有三篇，即《與崔連州論石鐘乳書》、《天說》和《設漁者對智伯》。僅三篇的文

²²¹ 柳宗元著，《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90-791頁。

²²² 柳宗元著，《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87頁。

章卻也是柳宗元文道所指的方向之一。柳宗元的文章中沒有過多關於摹擬的評論，其中一個原因可歸於茅坤當時的選文標準。既然當時的茅坤所選的文章是欲抨擊“秦漢派”文章中的一味擬古，那麼在他選擇的文章中自然就不能擁有過多文章是擁有摹擬的跡象的。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茅坤仍錄了柳宗元文章中擁有摹擬跡象的文章。且佔了近全文集中的百分之三的位置，便說明了柳文中的這個特色是應該讓學習古文的人所知道的。另外一點必須說明的，是柳宗元文章中的摹擬之跡並不在於文章中逐字逐句的仿擬，而是一種氣度上，文章中的意思上的相似。就如茅坤在《柳州文鈔引》中有言“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為掩卷累欬者久之”²²³，所欲說明的是柳文中與司馬遷文中那種悲愴悲涼的氣息上的相似。而除了這兩篇書信以外，在《與崔連洲論石鐘乳書》中，茅坤認為其乃“全學李斯《逐客書》”²²⁴之作，這裡的“學”，指的是其文章之中說服人的作文方式。柳宗元此文乃寫於其姐夫崔簡的書信，崔簡服石鐘乳中毒，卻“以為土之所出乃良”²²⁵。為了勸誡他，柳宗元便仿秦朝李斯上書秦始皇的《諫逐客書》寫法，信中所言“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慳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粗曠燥悍所中，俱傷子敬醇懿，乃習謬誤”²²⁶的開頭便是其學《諫逐客書》中“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²²⁷的證明。李斯在文章之中運用了比喻、對比、排比、反問等多種修辭手法，且結合了其人事、地理位置等的知識來勸誡秦皇；柳宗元亦在這樣的作文方式上從為崔簡健康的角度出發，書了這一封信給他。由此可見，茅坤

²²³ 茅坤著，《柳柳州文鈔引》，《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684頁。

²²⁴ 柳宗元著，《與崔連洲論石鐘乳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43頁。

²²⁵ 柳宗元著，《與崔連洲論石鐘乳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43頁。

²²⁶ 柳宗元著，《與崔連洲論石鐘乳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43頁。

²²⁷ 李斯著，《逐客書》，《李斯集輯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6頁。

雖然錄其有摹擬之跡的文章，所欲指的摹擬卻與“秦漢派”的宗旨是大不相同的。

《新唐書·柳宗元傳》中有云：“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憂鬱，一寓諸文，仿《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側。”²²⁸這裡說的是柳宗元受貶謫之後的心情感受，亦說柳文之中所透露出來的悲愴之氣。除卻上節中所談到的兩篇書信以外，柳宗元在其他文章之中亦有著這樣的悲愴之感，而這樣的情感宣洩往往都是體現在了柳宗元貶謫永、柳以後所做的文章。在《柳宗元文鈔》中，共有十一篇文章的評論是在說柳文中的悲愴之氣。²²⁹在這些以悲愴之氣為文章主要基調的作品中便有七篇文章是書信，從這些可以看出柳宗元在被貶謫以後的文風轉變。

以《答貢士廖方論文書》為例：

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嘩囂，群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污重厚，舉將而去遠之。²³⁰

“中多自矜，亦自悲愴”²³¹，此八字乃是茅坤對於這篇文章的評語，從一開始的在京城中“好以文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不少焉”的情況轉至被貶之後“益為輕薄小兒嘩囂，群朋增飾無狀”，“舉將而去遠之”的窘境，茅坤所言是為前者，而悲愴之氣則為後者。柳宗元在信的文末說：“即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

²²⁸宋祁等著，《新唐書·柳宗元傳》卷一百六十八，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5132頁。

²²⁹十一篇與“悲愴”有關的文章：《與李翰林建書》、《寄許京兆孟容書》、《與楊京趙憑書》、《與蕭翰林俛書》、《與裴頊書》、《答貢廖有方論文書》、《上李夷簡相公書》、《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送李渭赴京師序》、《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又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²³⁰柳宗元著，《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99頁。

²³¹柳宗元著，《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99頁。

詬罵也”²³²，全然表達出了柳宗元對於自己被貶之後的心境轉化其實是處在一種悲觀消極的狀態的。雖然柳文在悲傷語調之際亦有一種“文似悲風”²³³之感，然這一點也依舊無法掩蓋其中的悲愴之情。

除了書信來往的文章以外，以《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敘》來端看亦可看出柳文中的悲愴語調，茅坤評此文曰：“文瀟灑跌宕，惜也篇末猶多抑鬱之思云。”²³⁴柳文顯露出來的瀟灑，是一種觀天地之間自然萬物自然生長而成的一種自然感官，在文章之中，他說：“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征賢合姻，登舟於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影，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²³⁵看似瀟灑中帶有宕宕之氣，以景喻人，以人托景。然而，在文末的：“予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誌之。”²³⁶卻又透露出了他對於自身被貶之事，感覺從此不會再被重用而鬱鬱寡歡。

除了摹擬之跡和悲愴以外，柳宗元的“辯”構成了他文道中的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在《柳宗元文鈔》中，有九篇文章的評論是關乎其辯的²³⁷。在《與

²³² 柳宗元著，《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99-800頁。

²³³ 柳宗元著，《送李暹赴京師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863頁。

²³⁴ 柳宗元著，《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857頁。

²³⁵ 柳宗元著，《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857頁。

²³⁶ 柳宗元著，《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858頁。

²³⁷ 與“辯”相關的九篇文章：《與韓愈論史官書》、《答元饒州論春秋書》、《〈論語〉辯二篇》、《辯〈列子〉》、《辯〈文子〉》、《辯〈鬼谷子〉》、《辯〈晏子春秋〉》、《辯〈亢倉子〉》、《辯〈鶡冠子〉》。

韓愈《論史官書》中，茅坤說“子厚之文多雄辯”²³⁸，不論是他在京為官之時或是他被貶謫之後。除了那九篇有提及關於“辯”的評論的文章外。柳文中其實處處可見其“辯”之處。

柳宗元的辯文被茅坤喻為“千年以來罕見者”²³⁹。從孔子的《論語》到鷓冠子的《鷓冠子》，或長或短，茅坤評其說：“孔子沒，而百家之言各出其見，以相揣摩，而柳子厚為之辨析，並有指歸可觀覽”²⁴⁰。以《〈論語〉辯二篇》為例，上篇辯以考證《論語》書於何人之手，以“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也”²⁴¹為證，說《論語》其非出於孔子弟子而乃孔子弟子的弟子之手；下篇則辯以孔子之道，曰其“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然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雲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誌也，無容問對於其間”²⁴²。一條條一列列清楚的辨析論證，說明古代文人們治學的態度乃是由有疑處發證明以證其之實。另一篇《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戾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

²³⁸ 柳宗元著，《與韓愈論史官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71頁。

²³⁹ 柳宗元著，《〈論語〉辯二篇》，《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985頁。

²⁴⁰ 柳宗元著，《辯〈列子〉》，《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989頁。

²⁴¹ 柳宗元著，《〈論語〉辯二篇》，《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985頁。

²⁴² 柳宗元著，《〈論語〉辯二篇》，《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986頁。

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隘，使人猖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²⁴³

其文雖短，卻已集結了《鬼谷子》之書之出落以及其對後世之人的影響，還有各家之人對其的看法和柳宗元自己對此的辯解。除了柳宗元的辯文之外，先前提過的《與崔連洲論石鐘乳書》為一個簡單的例子，在文章之中柳宗元為了能夠說服崔簡服食石鐘乳的斃，從文起至文末著實未有一處不在辯。

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枯立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蜿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太社；荊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穀而輅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太醫；西子之裡，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儻，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閩外；山東之稚駮樸鄙，力農桑，啖棗慄者，皆可以謀謨于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²⁴⁴

文中舉出了各種物品以及其用處，看似是贊同崔簡“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的觀點，但尾句一“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卻又以反問的方式說明了上述所言不過是牽強附會之詞。然這以說法並不代表柳宗元上述所舉例中所言皆為錯誤的，這裏的牽強附會，不過是針對崔簡所說對石鐘乳“土之出者”的看法

²⁴³ 柳宗元著，《辯〈鬼谷子〉》，《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993頁。

²⁴⁴ 柳宗元著，《與崔連洲論石鐘乳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44-745頁。

雖為正確，然其“固多良而少不可”卻不是。故在接下來的段落中，柳宗元將敘述的角度由此轉向了藥理上的知識，從而得到了“又《經》注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著，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²⁴⁵的結論。

在其《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中亦可看出柳宗元文章中善辯、好辯的特性。茅坤雖評此文為“意氣淋漓”²⁴⁶，然此淋漓意氣處除指文章首尾連接處使人讀起來一氣呵成，亦是因為文章之中的雄辯之處使人閱之身心舒暢。此乃柳宗元上書欲留陽城之書，文中從“聞之悒然不喜”處論到而後的“遂寬然少喜”再到“撫手喜甚”處，看似柳宗元雖對陽城被調離京城之事深感寬慰，實卻有為陽城不平之處。再看以後柳宗元論古時學生與現今學生之間的求學態度，以帶出最後其欲論的陽城的師道。由頭至尾，環環節節相扣甚好。故茅坤方評其為意氣淋漓。

而提到柳文之辯，不得不提之處便是其與韓愈論史官職務之書。茅坤說“子厚之文多雄辯，而此篇尤其卓犖峭直”²⁴⁷，又引了唐順之的：“提其原書辯處，有顯有晦，錯綜成文”²⁴⁸來評價柳宗元此文之中的辯處。這裡提到的“原書”說的是韓愈先前寫的一篇《答劉秀才論史書》中提到關於自身對史官的看法。柳宗元《與韓愈論史官書》云：

²⁴⁵ 柳宗元著，《與崔連洲論石鐘乳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45-746頁。

²⁴⁶ 柳宗元著，《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39頁。

²⁴⁷ 柳宗元著，《與韓愈論史官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71頁。

²⁴⁸ 柳宗元著，《與韓愈論史官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74頁。

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敗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敌益众，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也？²⁴⁹

此段文章中，柳宗元先提韓愈對史官的看法，再提自己對史官的見解以辯之。然，茅坤雖言其“卓犖峭直”，亦說此文章“太露氣岸，不如昌黎渾涵，文如珠灌”²⁵⁰。這一見解應是因為柳宗元每每在辯之中會過於強求其文其事的條理性，因此在書文之中便少了韓文中那一種渾然天成，仿佛不需要加以修飾便可文如珠灌的感覺。而柳宗元的這一毛病在其他文之中亦可見得，茅坤說：“子厚每每文到縱橫時，便露此態。”²⁵¹此一態度說的便是文章中會給予人一種混雜不分的感覺，這樣的感覺被茅坤稱為“漫溷”，在《與李睦論服氣書》中可見得。漫溷處為：

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仇者失望而粟，親者得欲而忭。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剖羣羊以為兄饌，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醢敖倉之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臟之安，心恬而誌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欣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

²⁴⁹ 柳宗元著，《與韓愈論史官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72頁。

²⁵⁰ 柳宗元著，《與韓愈論史官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71頁。

²⁵¹ 柳宗元著，《與李睦論服氣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47頁。

悴悴焉膚日皴，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²⁵²

雖論服氣，至篇末柳宗元卻仍僅以“椎肥牛”、“擊大豕”、“割群羊”、“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等從旁議論和氣，而無一字正言服氣說。故茅坤言其給人一種混雜不分之感。然呂留良卻說茅坤此評價乃“是未識立說之用意耳”²⁵³。可見柳文之於茅坤雖有不足處，在其他文人心中卻未必如此。

而茅坤稱柳文“奇”，此柳文之奇與韓文之奇卻亦有不同之處，韓文之奇，奇在其理論善喻處；柳文之奇有二處，一奇在其善辯之處；二奇在其遊記之文。在《柳宗元文鈔》中，與“奇”相關的評論的文章有十二篇。²⁵⁴

在《全義縣復北門記》中，茅坤引了唐順之的“小題亦作議論”²⁵⁵指出了此篇文章的奇處。柳宗元在文章之中論賢、愚之分，以“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²⁵⁶為文章做立論，以“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悵且誣”²⁵⁷將賢與愚之別處區分開來。此文亦是柳文之辯，然其辯卻因柳宗元善辯、好辯的特色而展現了其奇特之處。而在另一篇《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的文章之中，柳宗元寫“以示其無有，而足下

²⁵² 柳宗元著，《與李睦論服氣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751頁。

²⁵³ 轉引自高海夫編，《唐宋八大家文鈔集評校注·柳州文鈔》，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第986頁。

²⁵⁴ 與“奇”相關的十二篇文章：《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啟》、《童區寄傳》、《全義縣復北門記》、《零陵三亭記》、《桂州訾家洲亭記》、《始得西山宴遊記》、《鈞鉞潭記》、《鈞鉞潭西小丘記》、《袁家渴記》、《永州萬石亭記》、《永州龍興寺東丘記》、《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²⁵⁵ 柳宗元著，《全義縣復北門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904頁。

²⁵⁶ 柳宗元著，《全義縣復北門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903頁。

²⁵⁷ 柳宗元著，《全義縣復北門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903頁。

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²⁵⁸，以辯其“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賀也”²⁵⁹。文章雖似辯，然亦可觀其奇之處。

除了將柳文顯露在其“雄辯”之處的“奇”點出來以外，茅坤亦將柳文中往往給予人一種耳目一新之感的遊記之文也點出其中的“奇”所處來。這一種“奇”，與上述所說的奇不一樣，前者的奇發於柳文辯之處，為了將他想辯的部分更加完整的發揮出來而引發出另一種讓人感覺奇妙的敘述法。而現在所將述之奇，則是發於柳宗元在遊玩之時所有的“好奇”、“探奇”之心。茅坤云：“公之好奇，如貪夫之籠百貨，而其文亦變幻百出。”²⁶⁰柳宗元的遊記文多寫於他被貶謫之後，茅坤曰：

按子厚所謫永州、柳州，大較五嶺以南，多名山峭壁，及清泉石怪，而子厚適以文章之雋傑，客茲土者久之。愚竊謂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予間過輿中，恣情山水間，始信子厚非予欺。且恨永州之外，其他勝概猶多，與永、柳相頡頏，且有過之者，而卒無傳焉。抑可見天地間，不特遺才而不得試，當並有名山絕壑而不得自炫其奇於騷人墨客之文者，可勝道哉！²⁶¹

上述中說的“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著實是茅坤對於柳文遊記文中最佳的見解。柳宗元被貶謫至永、柳州以後至其逝世都沒有再被召回京城，而他的遊記文也多是在此時才得以寫下的。以其《始得西山宴遊記》而論，其文寫地理風景遊玩心得，亦寫出了始得之趣味。

²⁵⁸ 柳宗元著，《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826-827頁。

²⁵⁹ 柳宗元著，《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827頁。

²⁶⁰ 柳宗元著，《鈞錫潭西小丘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931頁。

²⁶¹ 柳宗元著，《游黃溪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923-924頁。

先寫未知西山之奇而欲游西山，欲游西山之時方知西山之奇，后又寫因醉臥至夕暮終覺未游西山，卻說“然後知吾向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²⁶²。這一場從未游至欲游而後看似未得游卻為始游的遊記，在中途所描寫的山丘風景讓人讀之如若身在其山中，讓人看見了柳文的奇之處，故茅坤曰其文：“公之探奇，所響若神助。”²⁶³

又觀另一遊記《零陵三亭記》，題為“三亭”自便是由柳宗元游三亭之後所寫成的文章。此三亭根據高海夫在《唐宋八大家文鈔集評校注》中的註解曰：“三亭，在東山之麓，一曰讀書亭，二曰湘秀亭，三曰府清亭。”²⁶⁴此遊記文的妙處在於柳宗元借游寫政，再由政寫游，如此一來一往交互出來所想表達的是游與政之間互助相輔的關係。文中第一段書柳宗元對游政之間的想法：

邑之有觀遊，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憤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遊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²⁶⁵

柳宗元認為政與游之間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君子必有游息之物”而後才能“理達而事成”。游息之物指的是其休息玩樂的地方，只有擁有了足夠的休息和保持愉悅的心情才能使事物皆獲得更有效率的辦事態度。三亭為薛存義所做，其中的設備與其周圍的景色皆為“高明游息之道”，柳宗元十分喜歡這個地方。且柳宗元在文末亦曰：

²⁶² 柳宗元著，《始得西山宴遊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928頁。

²⁶³ 柳宗元著，《始得西山宴遊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927頁。

²⁶⁴ 轉引自高海夫編，《零陵三亭記》（注一），《唐宋八大家文鈔集評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第1176頁。

²⁶⁵ 柳宗元著，《零陵三亭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909頁。

在昔禪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遊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予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子曰：“吾志也。”遂刻之。²⁶⁶

次段落中柳宗元反復辨析究竟游息是否會對處理政事上起得一種不好的影響，最後他所得到的答案是“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始終認為遊玩與政事是需要一起存在的。對於柳宗元如此特別的遊記，茅坤認為此文章是：

“撈籠勝概，卻又別出一見解。”²⁶⁷宋代趙善愷在《柳文後跋》中亦說：“此殆子厚天資素高，學力超詣，又有佳山水為之助，相與感法而至然耶！子厚居永最久，遣言措意最古。衡、湘以南，士之經師承講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²⁶⁸

在這裡做一個小總結，《柳宗元文鈔》中茅坤評論其“文道”的文章有四篇；“摹擬之跡”的有三篇；論其“悲愴之氣”的有十一篇；談及“辯”的則有九篇；最多的是關於“奇”的評論，有十二篇，總計 39 篇的文章。這樣的比例只稍稍比茅坤對於柳文其他評論中的四分之一多一些。然而，就如上述所言，茅坤其他的評論多論柳文中的文法，並未即柳文的特色。柳文的文法是技巧，卻不是茅坤在編撰《文鈔》時首要的重心，提及文法，不過是讓爾後習古文之人曉得其中的作文要旨，然茅坤更重視的其實是文章中的精髓。故，柳文中的文法可以說是建立在柳文中的文道之上的。一個人若知曉其作文方法卻不能領略作文時的精神精髓，那麼寫出來

²⁶⁶ 柳宗元著，《零陵三亭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10-911 頁。

²⁶⁷ 柳宗元著，《零陵三亭記》，《文鈔》，合肥：黃山書社，2009，第 909 頁。

²⁶⁸ 趙善愷，《柳文後跋》，《柳宗元集》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9，第 1454-1455 頁。

的文章必然會顯露出其空洞的意思。柳文之文道，從其雄辯之處到其奇之見解，能體現出柳宗元在文學上的造詣，而其文章之中的摹擬之跡以及悲愴之氣，則能看出柳宗元的人生經歷。而這一些特點，也便構成了茅坤眼中柳文的獨特存在。

第五章 結語

從茅坤的背景與其文學理論開始論述直到後來他對韓、柳二人之文的看法，明中葉時期的茅坤在其文學理論上並非一味推崇唐宋時期的文章，而是推崇這兩個時期的文章之於亦推崇秦漢時期的文章。然而為了區別他與當時候盛行的“秦漢派”的文學理論，茅坤比起秦漢時期的文章更著重欲使人們看到唐宋時的文章。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秦漢派”打著“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標準積極推崇崇古擬古的寫作方法，這對於茅坤而言是一種剽竊的行為，為了反擊，他打出了唐宋時期的散文，目的是告訴世人秦漢以後亦有可觀可學的文章；二為選入《文鈔》的唐宋時期的文人們因為駢文盛行的關係在當時積極推動古文運動，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文人所寫出來的文章往往都是崇古，卻又因承載著自己的“道”而不之於擬古，而茅坤文學理論的核心則在於吸取古人文中的道再轉化為自身寫文的養分，故唐宋時期的文章對於茅坤當時候要表達的文學理論是相較於秦漢時期的文章更加合適的。

茅坤會將韓愈與柳宗元二人選入《文鈔》之中並將他們作為整部《文鈔》的首要位置，除了是表現出了茅坤的一種文學繼承的觀念，亦是因為韓愈的文章自秦漢文章漸沒以後出於唐代時就猶如一種忽然崛起的信念，像蘇軾先前提過的一樣起著一種“文起八代之衰”的動力，而茅坤的文學理念亦需要一位這樣的文人來宣揚和繼承；而柳宗元作為在唐代時期能夠與韓愈相互並肩的文人，其文章中亦涵蓋了茅坤所推從文學理念，因此選此二人進入《文鈔》就變得勢在必行。

茅坤對於韓文最重要的特點在於其本色。《韓愈文鈔》中雖不多提及與韓愈本色相關的文章評論，然整理茅坤對韓文的觀點之後，韓文本色卻是貫穿了韓文最

重要的核心所在。無論是韓文中顯露出來的奇特之處，亦或是文章中的澹宕之氣，還是韓愈擅長以退為進的婉言與善喻，都構成了韓文中最奇特的存在。更進一步的說，茅坤對其他文章作文執法的評論可以說是在韓文本色上建立起來的。

對於柳宗元文章中的文道也一樣。僅觀《柳宗元文鈔》中評論雖看似沒有與柳文文道相關的文章，然而整理評論以後且能夠看出茅坤對於柳文中一套自己文章要旨十分推崇，在柳文中的摹擬之跡，看似擬古卻並非如此，而是柳文中善於以古人知道論自己之道的一個方法。柳文中悲愴之氣看出了柳宗元被貶謫後的心境轉變，亦是茅坤認為柳文文風轉變的契機；雄辯之氣中的奇氣，這二者可謂自成一體又相輔相成，使得柳文中往往透露出一種使人眼前一亮的感覺。這些特點，也構成了茅坤眼中獨特的柳文文道。

在研究完成以後，使人感到好奇的，是韓文與柳文經常會被拿來比較。有認為韓文勝於柳文；有的則認為柳文好過韓文。尤其因為二者的文章學術淵源皆有不同，故此出現風格不一的情況其實是必然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要辨別二者文章特點中的高低，是極度困難，且最終亦會演變至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然而在茅坤的觀點里，韓文與柳文其實是各有千秋。韓文中有勝於柳文的地方，亦有較柳文而言較為遜色的特點。

在這份研究完成以後，深感對於茅坤論其韓、柳文中觀點其實尚有可以或深入或擴充研究的方向。尤其是對於茅坤以前的文人如何論韓、柳文；茅坤以後的文人怎麼論韓、柳文，都有其可發揮并更能深入了解茅坤對於此二者的文學接受的地方。故此希望在研究結束以後，仍能夠繼續進行更多關於茅坤文學接受的研究。

參考書目

1. 古籍

【清】紀昀著（2003），《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金聖歎著（2009），《天下才子必讀書》，沈陽：萬卷出版社。

【後晉】劉昫著（1975），《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宋】呂大防著（1991），《韓愈年譜》，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明】茅坤編（2009），《唐宋八大家文鈔》，合肥：黃山書社。

【宋】歐陽修、宋祁著（1975），《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清】張廷玉著（1975），《明史》，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2. 書籍

（1988），《韓愈研究論文集》，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

陳發前著（2002），《韓愈文集探元決異》，西北大學出版社。

陳克明著（1985），《韓愈評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陳新璋著（1996），《韓愈傳》，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陳新璋、方烈文、曾楚楠編（1998），《韓愈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鄧潭州著（1991），《韓愈研究》，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鄧國光著（1992），《韓愈文統探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董弟德校註（1986），《韓集校註》，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段醒民著（1978），《柳子厚寓言文學微探》，文津：文津出版社。

高海夫編（1995），《韓愈散文精品選》，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

方崧卿著（2002），《韓集舉正》，東京：汲古書院。

顧易生著（1962），《柳宗元》，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何法周著（1988），《韓愈新論》，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

洪流、黃挺、曾楚楠著（1988），《韓愈的一生》，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胡守仁著（1989），《韓愈敘論》，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黃雲眉著（1957），《柳宗元文學的評價》，香港：香港龍門書店。

蔣之翹校注（1981），《柳河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孔凡禮點校（1986），《蘇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李逸安點校（2001），《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

李世亮著（1994），《韓愈與陽山》，北京：北京三聯書局。

劉真倫、岳珍校注（2010），《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柳宗元著（1979），《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盧寧著（2006），《韓柳文學綜論》，北京：學苑出版社。

劉國盈著（1991），《韓愈評傳》，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羅聯添整理（1981），《柳宗元事蹟繫年資料彙編》，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會。

羅聯添著（1997），《韓愈研究》，台北：學生書局。

馬其昶校注（1986），《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錢伯城編（1993），《韓愈文集導讀》，巴蜀出版社。

錢基博著（1975），《韓愈志》，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前野直彬著（1966），《韓愈的生涯》，東京：秋山書店。

清水茂著（1958），《韓愈》，東京：岩波書店。

屈守元、常思春編（1996），《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市川勘著（2004），《韓愈研究新論》，台北：文津出版社。

施子愉著（1958），《柳宗元年譜》，湖北人民出版社。

孫昌武著（1982），《柳宗元傳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孫昌武著（1986），《韓愈散文藝術論》，南開大學出版社。

孫琮點校，《山曉閣評點柳柳州全集四卷》，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

臺靜農著，《柳宗元》，華岡出版社。

陶劍琴著（1960），《柳宗元》，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王更生著（1994），《柳宗元散文研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王寬行、王宗堂、張中義輯注（1991），《李斯集輯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汪乃珍著（1991），《柳宗元生平及其永州八記研究》，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魏仲舉輯注，《五百家注柳宗元文集殘本》，上海：商務印書局出版社。

吳文治著（1962），《柳宗元評傳》，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吳文治著（1962），《柳宗元年譜》，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吳文治整理（1964），《柳宗元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 吳文治著（1979），《柳宗元簡論》，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 吳文治整理（1983），《韓愈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 吳文治編著（1991），《韓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吳汝霖編（1982），《柳河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 吳小林著（1989），《柳宗元散文藝術》，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
- 吳小林著（1989），《柳宗元散文藝術》，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
- 行巖著（1981），《柳文探微》，台北：華正書局出版社。
- 閻琦、周敏著（2003），《韓昌黎文學傳論》，西安：三秦出版社。
- 楊國安著（2006），《宋代韓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殷孟倫、楊慧文校注（1986），《韓愈散文選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章士釗著（1971），《柳文指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 朱熹著（1981），《昌黎先生集考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朱熹校（1989），《昌黎先生集》，上海：商務印書局。
- 曾子魯著（1993），《韓歐文探勝》，中國文學出版社。
- 張大芝、張夢新編（1993），《茅坤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

張夢新著（2001），《茅坤研究》，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3. 論文

陳必詳著（1980），《柳宗元筆下的小石潭》，《語文戰線》第4期。

陳柱著（1936），《札韓篇》，《學術世界》第1卷第8-12期。

鄧小軍著（1993），《柳宗元散文的藝術境界》，《四川師大學報》第1期。

鄧小軍著（1994），《韓愈散文的藝術境界》，《人文雜誌》第1期。

範文志著（1991），《讀韓愈散文的諷刺藝術》，《齊齊哈爾師院學報》第2期。

範文志著（1991），《試論韓愈散文的語言美》，《大慶師專學報》第2期。

胡守仁著（1980），《柳宗元散文評述》，《江西師院學報》第1期。

胡守仁著（1981），《試論韓愈的散文》，《爭鳴》第2期。

黃傑忠著（1992），《委婉、雄直：韓愈贈序藝術探微》，《河池師專學報》第1期。

黃雲眉著（1954），《柳宗元文學的評價》，《文史哲》第10期。

高則明著（1937），《韓退之“挨罵”》，《寫作與閱讀》第 1 卷第 4 期。

龔德才著（1987），《澹宕多奇 不類舊常——試論韓昌黎碑誌創作的成就》，《中國文學研究》第 1 期。

郭明達著（1985），《論韓愈的雄渾》，《語言文學論文集》，北京：北方論叢叢書。

林春虹著（2012），《〈唐宋八大家文鈔〉與茅坤的文統觀》，《江西科技師範學院學報》第 2 期。

劉大傑著（1960），《柳宗元及其散文》，《文學遺產選集》第 3 集。

鹿琳著（1991），《柳宗元傳記文學的特色》，《齊齊哈爾師院學報》第 5 期。

鹿琳著（1992），《試論韓愈散文的章法美》，《齊齊哈爾師院學報》第 6 期。

鹿琳著（1994），《〈永州八記〉——柳宗元的精神世界與自然的完美融合》，《齊齊哈爾師院學報》第 6 期。

閔澤平著（2010），《茅坤與唐宋八大家學術譜系的建構》，《長江學術》第 3 期。

莫山洪著（2003），《論茅坤對柳宗元文章的接受》，《欽州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1 期。

錢基博著（1932），《韓文讀語》，《光華大學半月刊》第1卷地1-5期。

饒德江著（1987），《論韓愈傳記文學的生命力與藝術美》，《武漢大學學報》第3期。

王錫昌著（1936），《韓愈評傳》，《時代青年》第1卷第2期。

王章煥著（1996），《韓愈散文的敘事藝術》，《河南師大學報》第7期。

吳小林著（1986），《論韓愈散文的結構美》，《文學評論》第1期。

孫昌武著（1980），《試論柳宗元的散文藝術》，《南開學報》第3期。

孫昌武著（1981），《論韓愈散文的藝術成就》，《遼寧師院學報》第2期。

孫金榮著（1995），《韓愈散文與政治》，《山東社會科學》第5期。

太田次男著（1963），《長安時期的柳宗元》，《斯道文庫論集》第2期。

唐良著（1962），《試論柳宗元散文的思想性》，《揚州師院學報》第9期。

王達津著（1980），《談散文的意境——兼談“永州八記”》，《散文》第3期。

溫至孝著（1982），《論柳宗元的山水遊記》，《西北師院學報》第1期。

吳莉莉著（1988），《柳文的悲劇美》，《讀寫月報》第11期。

吳文治著（1979），《論柳宗元文學創作的藝術風格》，《文學論集》第一集。

吳小林著（1989），《論柳宗元散文的幽美》，《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 5 期。

星川清孝著（1976），《永州山水與柳宗元》，《新積漢文大系季報》第 46 期。

彥季著（1961），《柳宗元的議論文——讀柳宗元札記》，《光明日報》。

楊慧文著（1983），《論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唐代文學論叢》第 3 輯。

曾子魯著（1982），《試析韓愈散文立意謀篇的“奇處”》，《江西師院學報》第 4 期。

曾子魯著（1983），《試析韓愈散文的“變”與“奇”》，《青海師院學報》第 3 期。

張國榮著（1987），《韓愈散文的藝術成就》，《大學文科園地》第 2 期。

張嘯虎著（1984），《論韓愈政論散文的藝術成就》，《中州學刊》第 3 期。

張嘯虎著（1990），《柳宗元的政論文學作品》，《文史知識》第 9 期。

振甫著（1959），《柳宗元的散文》，《新聞戰線》第 19、20 期。

振甫著（1962），《談柳宗元的山水記》，《長江文藝》第 1 期。

周陸軍著（1989），《論柳宗元專輯的獨特性》，《湖南師大學報》第 4 期。

周奇文著（1984），《淺談韓愈散文“尚氣”的風格特征》，《長江師院學報》第 2 期。

周奇文著（1986），《時代需要與韓愈散文之風格》，《長春師院學報》第 3 期。

周奇文著（1990），《韓愈的人格與散文風格》，《長春師院學院》第 2 期。

周作人著，《談韓愈與桐城派》，《人間世》第 21 期。

周徵著，《讀柳子厚山水諸記》，《光華大學半月刊》第 4 卷第 9 期。